

领导科学论坛

THE FORUM OF LEADERSHIP SCIENCE

大讲堂

2020年第12期 总第182期

P₀₃ “十四五”规划《建议》核心要义
及其逻辑结构和关键措施

P₂₅ 新产业革命与欧盟新产业战略

P₄₇ 双循环经济学：反周期和逆增长

P₆₄ 什么是中国版数字货币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云平台是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媒体、智能知识组织和新一代天地一体信息网络技术独家创新研发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新型智能平台。平台为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方位的综合解决方案，实现了党务和业务的智能化融合，为党的全面领导、党建的全面引领提供了信息化路径和智能化手段，让党务和业务实现无缝对接。

平台系统结构

1 党员干部学习全媒体资源库

2 智能化知识组织系统

3 多级党务业务一体化云平台

4 党员干部多级学习平台



5 智能移动终端融合应用系统

6 智能化党建运营管理中心

7 大数据分析、监控、演示系统

8 北斗双向卫星站

创建平台的目的

- 解决党务业务“两张皮”问题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级多层重复建设问题
- 解决资源分散缺少系统性和逻辑性问题
- 解决缺少规范性和标准化问题
- 解决平台的安全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 “十四五”规划《建议》核心要义及其逻辑结构和关键措施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陈冬生(3)

◆ 新产业革命与欧盟新产业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孙彦红(25)

◆ 双循环经济学：反周期和逆增长

.....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 李光斗(47)

◆ 什么是中国版数字货币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若微(64)

编委会

顾问 张全景 刘道玉 张国祚

杨叔子

主任 陈建才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璋 王泽龙 别少波

别业舫 何兴亮 何国治

吴开胜 吴华品 周大仁

周勇 周祖元 赵耀宏

顾杰 秦在东 梁前德

彭元杰 谢成宇 蔡尚华

熊泽金

董事长 肖昌斌

总经理 周发秋

社长 谢成宇

主编 陈建才

副主编 张永平

执行主编 夏晓畅

外联部主任 薛红霞

发行部主任 董晓丹

读者服务部 周蓉国

责任编辑 王韬 赵春燕 钟雪

马程 侯欣 周凯

美术编辑 田良娟



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只要我们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就可以获得无穷的力量，风雨无阻，奋勇向前。

——习近平

主管单位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联办单位 国家与地方治理网

北京新时代中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原北京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编辑出版 领导科学论坛杂志社

发行广告部电话 010-68006063 68005003

编辑部电话 010-62807007转8148（北京）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2-1837/C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广告经营许可证 广登准字（2019）4200000016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
鸿儒大厦B座二层（西楼梯口）
武汉市洪山区桂元路67号

编辑部邮箱 xxwdjt@163.com

ldkxlt@sina.com

出版时间 2020年12月15日

印 刷 廊坊市凤海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5.00元

“十四五”规划《建议》核心要义及其 逻辑结构和关键措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系列解读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陈冬生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重大举措，集中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不仅新时期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也对五大文明建设与新发展格局提出了新要求。

关键词：“十四五”；十九届五中全会；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双循环

本文主要是从四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行了解读：第一部分是“十四五”规划《建议》要点：全面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第二部分是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逻辑结构；第三部分是关键措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第四部分是践行要求和态度：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障。

一、“十四五”规划《建议》要点：全面现代化发展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对于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目标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重大举措，集中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不仅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了全面部署，也对五大文明建设与发展格局提出了新要求。

2020 年，“十四五”规划通过了几个节点，然后进入了编制进程。2020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于 2020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0 年 8 月 1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若干重要问题专题调研工作情况的报告。2020 年 8 月 16 日至 29 日，“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活动，最终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101.8 万条。2020 年 9 月 28 日，《建议》稿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提请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对战略布局有了一个新的表述，即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以前所强调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现在该项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新的规划中对第一个全面有了新的表述，即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四五”规划《建议》总共有 15 个部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板块。总论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立足于分析现在，展望未来，主要阐述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就、我国发展的环境以及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第二部分则阐明了“十四五”时期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主要目标。分论部分总体上按照新发展理念的内涵来展开，分领域阐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结尾部分主要阐述了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规划机制，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的保障。规划《建议》的逻辑主线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即“三新”——新阶段、新理念、

新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简而言之，规划《建议》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个“新”上，就是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

以上是对“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结构性分析与提要，在此我们可以对“三新”做一个解读。“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要义就体现在“三新”上：一要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的新特征、新要求，积极主动迎接挑战，发扬斗争精神，努力化危为机，解决一系列影响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周期性、体制性问题，培育强劲持续的发展新动能，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二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强顶层设计和战略布局，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三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据我国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好地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众所周知，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953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规划，至今已经制定和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如今，我国进入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时期，“十四五”规划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时间为2021年至2025年。“十四五”规划涉及方方面面，内容丰富、全面，包括民主法治、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乡村振兴、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文化艺术、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创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

那应该如何理解新发展阶段呢？其实，我们可以把新发展阶段分成三个目标，即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我们一定要记住，5年之后有15年，15年之后还有一个目标是30年。2019年中国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占世界经济比重的16.3%，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且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即将消除绝对贫困。今后5年，我们的新发展阶段将由原来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阶段过渡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第

学习心得

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中央提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也就是 2049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远期目标。在这中间还有一个中期目标，所以 2035 年这个居中的时间点也就成了完成中期目标的截止年份。

当我们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接下来的 15 年就要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军，再往后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后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央所提出的新发展阶段是一步一步来的，近期目标、中期目标、远期目标一步一个脚印非常清晰。这个新阶段有几个新特点，尤其是特别强调科技创新，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过去的以跟跑为主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领跑。1840 年鸦片战争，我国的农业文明被西方的工业文明击溃，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或者说技术革命，我们“跟跑”搭上了末班车。现代化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很多国家已经进入了后现代化时期，而我们由于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后起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真正的现代化是从 1949 年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实现了政治现代化，但经济现代化还没起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因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后来又受到苏联的打压，我们被迫关起门来搞建设，自力更生、奋发图强。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同志开创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融入经济全球化，所以融入经济全球化才是我国真正现代化的开始。

从前，我们的科技主要是靠引进、学习国外的，承接了那些先发现代化国家产业链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科技创新首先是从学习、模仿开始，然后逐步开始科技创新，所以是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这是一个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的转变问题，我们要以开放的态度重新建构创新话语体系。之前，科技创新的话语体系都是西方构建的，我们最多也就是填补人家的空白，因为我们还没有制定自己的标准，不能创造话语体系。后来，2018 年《国务院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印发，提出完善创新创业产品和服务政府采购等政策措施。当前，我国科技在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也面临“卡脖子”的难题。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全国两会上指出，

我国科技创新由跟跑为主转向更多领域并跑、领跑。我国在量子通信、中微子、铁基超导、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领域的科技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在高端芯片等诸多高技术领域依然受制于人，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亟待解决。

在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要想在创新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如图 1）



图 1：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而且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与共产党的执政理念相吻合。首先，我们的执政党要带头转变发展理念，树立新发展理念，共产党员要有担当精神，扪心三问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差距在哪里，该怎么做、如何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接受专访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我们强调发展理念，但无论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还是共享，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因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执政党奋斗的目标。

发展新格局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发展格局之下，我认为要构建“五大文明+”。首先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即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其次，“五大文明+”加的是港澳台国际人类命运共同体。“五大文明+”治理体系争取可以推广延伸到全球治理现代化，当然我们首先要把国内的事情搞好。

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内循环为主。之所以叫新发展格局，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其中，出口占 1/3 还要多，这说明我们对外的依存度偏高。现在，国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中美贸易战有些因素对我们不利，因此我们要未雨绸缪，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突破人家的封锁。为此，我们提出了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放眼世界，国内国际良性互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面有些提法特别令人关注，包括：

1. 预计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百万亿人民币；
2. (“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成果举世瞩目，五千五百七十五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3. (“十三五”时期)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
4. (“十三五”时期)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十三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近十亿人；
5. 全国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6.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7. (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
8. (到二〇三五年)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9. 战略布局表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10.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为根本目的；

11.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12.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13.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4.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15.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6.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17.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18.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

19.建设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平安中国、数字中国。

这些提法体现了新时代的新气象，既为新时代的新阶段带来了压力，也增加了动力。

二、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逻辑结构：新时代承前启后三步走

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逻辑结构，即“三个时代三步走”。实际上，时代是按照历史方位的时代主题来划分的。从横向来讲，涉及国家发展的阶段，国家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所以根据历史方位判断，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华民族按照历史方位的时代主题，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先后经历了 60 年，主题是战争与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是生死矛盾。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走向民族复兴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 100 多年的屈辱历史。毛泽东同志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务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但 1949 年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不承认中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打压我们，所以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错过了技术革命，错过了参与全球化的机会。因此，我们虽然站起来了，但是是勒紧裤带站起来的，人

民生活比较艰难，甚至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

第二，邓小平时代。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贫与富的矛盾，对怎么解决温饱问题走向富裕做了重要判断。当时，苏美争霸形成了“核恐怖均衡”，消除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核战争爆发的风险。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必须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温饱问题，走向富裕。整个时代都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总设计下运行的，一张蓝图绘到底。2010年，我国GDP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

所谓的邓小平时代就是“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现在，我们GDP总量提升了，总体而言富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实现共同富裕。所以到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第三，习近平时代。中国开始进入新时代，要解决的矛盾是强弱的矛盾。2012年党的十八大，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其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目标——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间段是从2012年到2050年，要实现强国梦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我们变得强起来，中华民族才能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才能全面统一。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始终支持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同世界各国共谋发展。从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评论：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邓小平带领中华民族富起来，习近平将带领中华民族强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重大进展，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这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也被体现出来了。

铸牢人民至上理念，向美好生活砥砺前行。提升党建引领力和基层治理力，凝聚社会多元共建强大合力。提高风险防控力和绩效评估力，大幅提升社会治理有效共治水平。增进城乡融合力和人民幸福感，深度打造社会共享新格局。

在新冠疫情危机、全球经济急剧衰退以及美国对华制裁不断加强的背景下，我国讨论了经济和社会未来五年的主要发展方向。“十四五”规划《建议》就是在各种不确定性、挑战、压力和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不利形势下展开制定的。中国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将“为中国和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更有韧性、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将在未来几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增长引擎。

当前，面临复杂变化的发展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决策的一次重要会议。《建议》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纲领性文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战略眼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战略指引。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此时我们要解决三大问题，需要新的战略和策略。第一，国家要有方向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全面建成小康，第二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步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方向感。第二，中产阶级要有安全感。我们要建立一个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属于主体。社会精英都在这个群

体中，如果没有安全感，人才就会流失到国外，资产随之也会转移，所以必须建立中产阶级安全感。实际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所以，我们采取了吸引人才的政策。2019 年就有 260 多万海归人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三，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期望在 2000 年的时候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到 2000 年的时候，虽然从 GDP 总量上看是富裕了，但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当年，社会矛盾群体事件、恶性案件频发，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为农民工讨工资并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后来，又取消了农业税，把农民纳入了医保，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样做虽然缓和了社会矛盾，但到目前为止，贫富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解决这三大问题，关键是要跨越三大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塔西佗陷阱。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谩骂，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扩大对外开放。”

“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应该任由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破坏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而要以建设性姿态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更好趋利避害。”“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坚定信心、增强勇气、共克时艰。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在开放中创造机遇，在开发中创造机遇，在合作中破解难题，携手创造人类更加

美好的明天！”这实际上解释了“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理念。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坐标上，2021年到2035年将是怎样的15年？

《建议》里面有这样一段表述，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这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正是对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具体谋划。到那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设想，将提前15年成为现实，而“十四五”时期则是这一阶段的开始。

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内在逻辑关系

现在，我们分析一下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逻辑关系。首先要看内在逻辑，然后是外在逻辑，最后看复合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三新”，即新矛盾、新目标、新思想。我们用上述分析框架理解“三新”，新时代是相对邓小平的新时期而言的，新时代有新的历史方位，新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新的历史方位，分为“三步走”。同时，我们也遇到了新矛盾。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换言之，也就是穷的矛盾毛泽东时代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个豆腐都要豆腐票。所以，我们都吃半饱，穿半暖，这样才能保证人民群众都能够活下去。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了，穷的矛盾解决了，现在又有了新矛盾，党的十九大做了这样的表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现在是富的矛盾。穷有矛盾很好理解，如何理解富的矛盾呢？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他的兄弟邓垦问他，现在国家很穷，所以矛盾很多，那今后我们富裕起来之后是不是矛盾就没有了？邓小平同志回答，没矛盾就没有世界，穷有穷的矛盾，富有富的矛盾，富起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多，当然性质不一样了。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的，那为什么富起来了还有矛盾？一方面人民群众要过美好生活，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对国内而言，贫富差距太大。另外，行业与行业之间有差距，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差距，沿海与内地有差距，这就是不平衡。还有一个就是不充分，相对以前我们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但以人均计算由于我国人口数量多，还不算富裕。

有些人羡慕美国的高消费、高消耗，把美国当作美好生活的榜样。但我们

不能跟美国一样，我们要有新的发展理念，同时要有新的生活理念、幸福理念。事实上，美国的高消费、高消耗是建立在两个条件基础之上的：

第一，美国资源丰富，其国土资源相对于人口数量是很丰富的。第二，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发战争财，现在是全世界的霸权国家，称霸世界是其国家核心利益，他通过剥削全世界、转嫁危机实现发展，而我们不能走他的老路。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要过美好生活，我们就要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合作共赢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走向了非洲，走向了南美洲，走向了全世界，我们的高铁、物流、劳动力都是面向全球的。

西方有句名言，利益到了哪里，你就必须保护到哪里。我们要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解决新矛盾，树立新目标，所以我们加快进度，把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提前 15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的现代化不是单方面的，政治现代化是从 1949 年开始的，经济现代化是从 1978 年开始的。在新时代，我们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2035 年打下基础之后，从 2035 年到 2050 年的 15 年期间，我们就可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时代我们要树立新目标，解决新矛盾，这就形成了一个内在逻辑关系。在整个新时代，也就是从习近平任总书记上任的 2012 年到 2050 年这一段时间，第一阶段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我们已基本实现。第二阶段是现在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段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内在逻辑。

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外在逻辑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我们把它分成 ABC：A.“十四五”：构建新时代的主体工程；B.内循环：着重高质量发展新格局；C.外循环：靠实力以促成合作共赢。

现在，因为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了威胁，美国开始搞单边主义，搞新冷战。美国人有一个“美国思维”，特朗普曾经说过，美国打不赢俄罗斯，但打不赢的敌人就是朋友，这就是美国思维。因此，我们提出合作共赢，想美国与做朋友，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习近平总书记在检阅部队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观点，要想不打仗就得准备打仗，而且能打赢。也就是说，要以战止战。当我们拥有能够打赢美国的实力，美国也就不敢轻易挑衅中国了，那

时他就会接受我们提出来的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全面现代化发展新格局的复合逻辑

我们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障。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因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使命”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第一，情感逻辑。人民群众与执政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责任政府逻辑来分析。执政党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党和人民群众的党群关系是血肉关系，有一种无限连带的责任感情，所以不能简单利用有限责任政府来划定。

第二，历史逻辑。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成立的，翻看中国的革命史就会发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也就没有新时代，这就是历史的逻辑。

第三，理论逻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转折点，上层建筑会直接对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一切工作的领导核心。

第四，现实逻辑。当前，美国处处制裁压制中国，中国要想继续发展下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得强大起来。首先要实现现代化，第一步要消灭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三步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十四五”规划关键措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积极融入，主动作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突出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各个领域提出一系列战略性、创新性举措。比如，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引领地位；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提出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强调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把安全发展贯彻到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首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特别是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出了战略部署，明确了主攻方向和重要着力点。这些战略性、创新性举措，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回应人民群众诉求和期盼，对于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重塑竞争新优势，确保我国发展行稳致远具有重大意义。

在这些重大举措中，“双循环”的目标十分具有挑战性，因为“双循环”受国际以及事业性制约的因素很多。我国以前有一段时间过于依赖于外贸、外需。2008 年、2009 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受到了冲击，特朗普上台后又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等，挑起了中美对决，这又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再加上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整个世界经济形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发展仍然过于依赖于外循环，就会很被动。所以我们提出，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优先国内经济增长的“双循环”目标，确定振兴高科技产业和扩大国内市场的方针，这就实现了思维方式和方式新格局的转型。从前，我们偏重于外贸外循环，甚至依赖于外循环，现在我们转向依赖内循环，以内循环来促进和带动外循环。所以，“双循环”战略和进一步改革开放也将是未来发展的关键点。这项五年规划还包括发展低碳经济和降低能耗的措施，这样才能兑现我国提出的力争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

在国际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承诺了生态文明建设碳中和，也提出了具体指标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在实现自力更生的同时继续从全球化中获益，这一双重目标称为“双循环”，这是一个挑战。“双循环”会遇到困难，我们一定要有思想准备，要立足于内循环，先开拓国内市场，再带动外循环。目前欧美有些国家的疫情还没有好转的迹象，国际市场的未来走向很让人担忧，但我们的现代化步伐不能放慢。

内循环：大力振兴国内市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关注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是国内市场，并力争在芯片制造等领域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给自足。自给自足和扩大内需是新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除技术部门外，创新、粮食生产和能源领域的自给自足程度也会加深。

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大争论——“技工贸”还是“贸工技”，以前有些企业走了一条“贸工技”的道路，为了眼前的利益忽略创新从而失去了长远的发展。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自己做不用买。有段时间，我们把国外的东西买过来组装一下，然后再卖给全中国老百姓，赚中国人的钱，走了一条贸、工、技的道路，就是把技术创新放在最后，把贸易赚钱放在第一，结果造成了核心技术研究的搁置。

最近几年，出现了中美贸易战、科技战，特别是对华为、中兴的打压。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大力振兴国内市场，关注我们的短板，特别是芯片领域。党中央提出了多项重要倡议，包括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就是“十四五”规划的基础，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提高自给自足程度。以前我们总是购买美国的产品，不注重创新，后来贸易战、科技战打响了，让我们更加清楚了自身的短板，使我们不得不去创新，中央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要做好美国搞切割，新冷战的万全准备。

如何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强调几个“要”：

1.要统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发挥产业基础、综合交通、营销环境、改革创新等优势，围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打通堵点、连接断点，促进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创新推行“链长制”，在重点领域产业链修复提升、产业生态培育构造等方面积极探索。

2.要在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基础上，加快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智慧交通，让5G、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交通运输发展，加快畅通城乡微循环，串联更多经济发展体。这些我们都已经有基础了，比如华为的5G技术在世界上是最领先的；中国的云计算特别是应用领域，也是世界领先的，老百姓用手机支付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在信息技术方面，美国设计出了IPv4、IPv6，而我国率先设计出了IPv9，所以今后在物联网方面我国也可能领先世界。那么，我们关键是要把这些原创的技术运用到应用领域，发挥出它的整体效能，串联更多的经济发展体。

3.要进一步加大对跨境电商和电商企业的培育，引导传统外贸企业和本地传统企业适应线上市场需要的变化，充分利用电商平台，改进自身产品，提升网

络销售能力，同时适应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的需求。我国的电商在国内已经普及，在国际上已经打开了渠道。但现在，一方面遭到了美国的打压，另一方面又遇到了新冠肺炎疫情，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做努力，很可能就会局限于国内，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无法持续扩大。中国是制造大国，我们的产品必须走向国际，到全世界去流通，这样才能够发挥我们制造大国的优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要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三句话：走向发展新阶段、坚守发展新理念、构建发展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三个问题反复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2020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近年来，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2020 年 4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强调，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我国有 14 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 1 万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化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的增长空间。

2020 年 8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要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根据我国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20 年 11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

表主旨演讲。开放带来进步，合作才能共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进入加速演变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作的大势没有改变。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加强合作沟通，共同扩大对外开放。”“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新时代中国坚定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与世界共享美好未来。“三个致力于”发出开放合作的中国声音：我们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赢的共同开放；我们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担的共同开放；我们要致力于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强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要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

四、践行要求和态度：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障

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建议》，要深入学习领会，真正吃透精神，做好宣传解读，打牢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全面领导为保障。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主动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对标对表。“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目前要做的就是卯足力气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一件抓落实。

推动“十四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做到五个“必须”：

1.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

2.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

3.必须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4.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

5.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

规划《建议》的起草主要把握了五条原则:

1.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2.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

3.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4.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确保不发生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

5.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做到既高瞻远瞩又务实管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就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工作部署,对在复杂环境下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强化高质量增长,淡化 GDP 目标

这里要强调一下,淡化 GDP 目标不是不要 GDP,而是要有质量的、有效的 GDP,要保障民生基本生存状况的 GDP。如果为了 GDP 而不顾民生,那都是无效的 GDP。

强化高质量增长,淡化 GDP 目标,最为核心的是理念的转变,重构 GDP 规则下的话语体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局限于把 GDP 的增长作为发展的硬指标,构成了考核政绩的话语体系。现在,我们要重构话语体系,评价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不能“唯 GDP”,而是要看其是不是促进了

高质量增长。

“十四五”规划还优先考虑一些能够在面对外部波动时增强中国抵御能力的替代方案。可能不一定设定很具体的、精确的 GDP 增长目标数字，重点更多地放在改善人口收入和生活条件上。随着转向高质量增长，中国可能会在即将出台的规划中淡化 GDP 目标。

为了使经济免受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可预见的出口下降的影响，中国将致力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对振兴国内市场以及与友好国家和地区加强关系来说更重要。因为世界不是铁板一块，美国要封锁我们，要与我们切割，但全世界只有少数西方国家追随，所以我们要争取大多数，特别是与我们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还要通过合作共赢、“一带一路”扩展我们的全球市场份额。

“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将包括经济增长质量、技术和创新、体制改革和建设高端的产业供应链。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让老百姓心里有希望感。

“十四五”规划七大关键点利好民生，涉及到生育、收入、房地产等。2020 年 11 月 3 日晚上，“十四五”规划《建议》全文发布，对未来 5-15 年中国经济如何发展、人民收入如何提高，房地产政策走向何方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等民众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具体阐述：

1.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2 万美元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

2.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是实现双循环的关键。为什么我们以前想拉动内需却拉不动，因为贫富差距比较大。实际上，低收入群体有需求，但没有经济实力，所以我们一方面生产过剩、产能过剩，另一方面群众没有钱购买，所以市场是理论上的市场，而不是有效的市场。因此，我们必须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将他们的需求变成现实的市场需求。

3.生育限制有望继续放松：计划生育的服务水平要提高。我们以前推行计划生育，偏重于数量型的控制，不太强调质量的提高。生育质量的提高，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系统，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现在，我国的养老保险还没有实现全国统筹，今后要走向全国统筹。另外，推迟退休年龄也不能一步到位，要逐步分阶段推迟。

5. “房住不炒”成为中长期国策，改变地方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虽然中央强调“房住不炒”，但是因为地方财政与土地财政是相捆绑的，与开发商的利益是相贯通的，所以就有了炒房的动力。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政策和强力压制是不行的，必须疏通利益链条，稳定房地产市场。

6. 新、老基建将并重前行：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近年来，我们特别强调新基建，但是不能忽略老基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有些基础设施、住房、市场还有刚需，所以我们要新老并行，只有这样才能全盘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基建可以拉动几十个产业。当然，在发达地区新基建是重点，但在中西部落后地区，新基建体系可能无法在短期内建成，重点还是老基建在起作用，所以我们要兼顾。那么，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怎么来界定？要构建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产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构建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基础设施建设要从过去的以“铁公基”为主的“老”基建逐步向以5G、新能源、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基建方向转变。未来在“新基建”实现较快增长的同时，中西部“老基建”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要因地制宜。

7. 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是抓国有经济、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布局：做强、做优、做大。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我们要形成市场竞争主体，以分为主，现在改革开放40年了，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不在多，而是要做优、做强、做大。要推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维护我国的经济主权、经济利益，要发挥支柱性、基础性作用。为此，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比如《关于新时代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这些都是为了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做大，应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促进以内循环为主，内循环外循环相互推动而制定的。

8. “互联网+”和“数字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互

联网+”，现在又特别强调“数字中国”，这是一个大范畴。“互联网+”和“数字中国”渗透社会发展的每个环节，网络基础建设加快发展，数字门槛不断降低，数字经济动力澎湃。从移动支付、直播电商到共享出行、工业互联网，从4G大规模普及到5G商用全面提速，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智能化生产方式演进升级，平台经济迅速崛起。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的36.2%，这说明我们这些年的进步很快。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开通5G基站超50万个，累计终端连接数已超过1亿。未来，具备高速率、大容量、低时延等特性的5G将成为促进数字化转型、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利器。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快发展“三链同构”“三产融合”“三生贯通”。漯河市委书记蒿慧杰认为，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只有有的放矢延链补链强链，构建更好的产业生态，才能进一步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要充分发挥交通区位物流等优势，打造绿色食品产业生态，培育细分领域的产业集群，进一步健全产业体系，努力在双循环的大格局中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同构”，促进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推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贯通”，开放带动战略“陆、空陆海网”四路协同并进。到2035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时，这些都要变成现实。

对于革命老区的建设，我们要发挥“三色资源”，推动文旅融合助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以前，革命老区一般被称作“老少边穷”，相对来说它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甚至有些地方交通都不便利。但是，这些地区拥有“三色资源”，即古色资源、红色资源、绿色资源。古色资源指传统的、古老的代表传统文化的资源，包括一些考古资源；红色资源是革命根据地资源；绿色资源是指近年来退耕还林之后，良好的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发挥每个地方的优势，革命老区要发挥三色资源的优势。通过这些举措，预计到“十四五”规划实现的时候，特别是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实现的时候，我们能取得较好的成果。

民间预期：十年内或超过美国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以贯之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建议》既保持了党的目标的连续性，又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新内涵，明确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思路。在未来的十年内，与美国摩

擦加剧的可能性支撑着中国加快制定使自己免受世界经济动荡影响的战略。这就反映出中国对当前全球氛围进行了现实的重新评估，自力更生就是要通过投资研发和创新来挖掘国内的潜能，这是对外部不确定性做出的必要审慎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长期实行的“敞开大门”开放政策。改革开放这个方针是不会变的，强调内循环不是转向国内封闭起来，主要是通过立足于国内的内生化拉动外循环，促进外循环。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向外国资本和竞争敞开大门，我们越有实力就越不怕开放，越开放就越能促进我国的发展。

如何做好“十四五”规划

我们有六大要求指明了我们的发展方向：

- 1.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
- 2.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 3.要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
- 4.要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
- 5.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 6.要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局面。

五、结语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铸牢主体工程。我们要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新格局。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肖丽芬

新产业革命与欧盟新产业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孙彦红

摘 要：新产业革命是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欧美国家迅速兴起的概念，并且向全球快速传播。既然叫新产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当前正在推进的这一轮产业革命。

关键词：新产业革命；欧盟；战略；政策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概述

我本人研究欧盟的产业政策已经有十几年了，从 2005 年开始就关注研究欧盟的产业问题和产业政策。我曾于 2012 年出版过一本学术专著《欧盟产业政策研究》，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欧盟（欧盟委员会）层面产业政策的学术专著，这本书重点关注的是欧盟产业政策的发展历程、进入新世纪的发展动向、主要内容、制定与执行机制、与成员国产业政策的关系，相关的经济政策理念以及对中国的启示等等。通过这本书，我深深地意识到产业政策说到底就是最能透彻观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政策。这本书出版之后，最近几年我也在一直关注欧盟的产业问题和产业政策的进展。

我做研究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政界和学界对产业政策的态度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但发生质变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因为我研究欧盟产业政策多年，2007 年我到欧盟委员会所在地布鲁塞尔的产业与企业总司去拜访，他们是专门负责制定欧盟的产业政策的。当时，我联系了他们司的一个官员，跟他聊了一下他们的产业政策。我问他们，欧盟委员会是怎样协调成员国产业

学习心得

政策的？这个官员是法国人，他跟我说他们没有任何协调，因为成员国基本上都不承认自己有产业政策。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没有协调呢？比如说英国，2007 年英国还是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政策氛围，所以英国是不主张有产业政策的。而法国一直都有产业政策，但因为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所以法国也不承认自己有产业政策。如果公开表示有产业政策，和当时的主流认知是不相符的。同样的，经济学界也一样，从 1980 年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很不活跃，甚至一度陷入了沉寂，有很多年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基本上停滞了。

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时间上来看，2009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英国于 2010 年提出产业战略，2012 年欧盟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2013 年德国提出了工业 4.0 战略，2013 年和 2015 年法国分别提出了新工业法国战略和未来工业战略，2013 年和 2016 年意大利分别提出了国家能源战略和工业 4.0 国家计划。列举重要国家制定的产业战略主要想说明，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是如何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政策舞台阴影地带重回经济政策舞台中央的。这一波产业政策的回归是富有新内涵的产业政策与产业战略的回归，实践产业政策又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在理论界也就是经济学界相关的讨论也热烈起来。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16 年，在他和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联合主编的《产业政策革命》（《The Industrial Policy Revolution》）上下册中，斯蒂格利茨给这本书写序的时候写到了一句话，如今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已被几乎所有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所认可，不论其政治意识形态归属如何。这说明，在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认识讨论在升温，而且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基本上达成了共识。2016 年下半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和张维迎教授发起了有关产业政策的大讨论。实际上，这场大讨论 2017 年还在持续，而且吸引了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参与，也包括德高望重的吴敬琏先生。虽然这场讨论最终没有达成共识，但却很有意义，它的意义就在于引起了学界和政府部门开始思考新时期中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这个问题了。

2018 年年底，我的书稿《新产业革命与新产业战略》完成，2019 年 5 月出

版。该书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9 年创新工程重大科研成果。本书以新产业革命为背景，结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盟面临的内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从实证考察到理论探讨，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近年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而出台的新战略。

下面是这本书的目录。（如图 1）

章节目录

- 序
- 引 言
- 第一章 新产业革命的兴起：一个理论综述
- 第二章 欧盟的新产业战略——再工业化
- 第三章 欧盟关键使能技术发展战略
- 第四章 欧盟智能电网发展政策
- 第五章 德国：工业 4.0 战略
- 第六章 英国：产业战略与新产业战略
- 第七章 法国：“新工业法国”计划与“未来工业”计划
- 第八章 意大利：国家能源战略与工业 4.0 计划
- 第九章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的投融资政策——以绿色金融为例
- 第十章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落实进展评估
- 第十一章 理论探讨：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演变的新趋势
- 第十二章 总结与评价——兼论对中国的启示和影响
- 附 录
- 参考文献
- 后记

图 1：《新产业革命与新产业战略》章节目录

这本书的前三章是对欧盟层面的政策研究，包括欧盟再工业化战略以及欧盟再工业化战略提出的两个关键领域，第一个是关键使能技术，第二就是智能电网。在对欧盟层面进行研究之后，又对欧盟的 4 个重要成员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近年提出的产业战略进行了研究。在我做这项研究的时候，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英国一直是欧盟的成员国，虽然已经开始跟欧盟进行脱欧谈判，但他一直是欧盟的成员国。英国是西方重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主要发生地，所以说考察欧盟的问题，完全不看英国是不可取的。

二、研究主线与研究发现

在主线研究方面，我采用了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这两条线并行前进、相互交错、相互印证。

（一）研究的两条主线

1. 实证研究

书中较为系统地梳理分析近年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德、法、英、意）出台的新产业战略，包括战略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具体举措、落实进展，等等。这条主线旨在将本书实证研究的内容串起来，试图回答一系列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可称为本书的“明线”。

2. 理论探讨

深入挖掘近年来西欧主要国家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变，既包括相关经济理论的发展变迁，也包括产业战略实践所体现的政府功能的变化。简言之，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西欧各国开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而新产业革命则决定了其政府经济职能更多地向推动创新转型。这条主线旨在将本书理论探讨层面的内容串起来，尝试回答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为什么”出台新产业战略及其新产业战略“为什么如此”等问题，可称为本书的“暗线”。

（二）研究发现

下面讲一下我做这项研究的几个研究发现：

1. 有关新产业革命的趋势和特征

新产业革命是近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欧美国家迅速兴起的概念，并且向全球快速传播。既然叫新产业革命，实际上就是当前正在推进的这一轮产业革命。

熊彼特是创新经济学的鼻祖，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我在进行有关产业革命的理论探讨时，首先深入研究了熊彼特的“连续产业革命”理论。后来，出

现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流派的经济学家，又对熊彼特的“连续产业革命”理论进行了发展。熊彼特是在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的基础上引入的创新理论，他提出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长波都是独特的，但是若深入分析经济系统中能产生波动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波特特性就是创新，而创新又是通过连续产业革命的方式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熊彼特提出，实现产业革命不能依靠个别产业的量的增长，而是要通过新技术应用实现经济的质的转型，这种质的转型的周期性出现就构成了连续产业革命。

新熊彼特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著名创新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和洛克·苏特，他们在知名著作《工业创新经济学》当中，将18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末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归结为五个由技术变革推动的连续的“波”。（如图2）虽然学术界对这五次“波”的划分以及每一次“长波”的时间跨度存在争议，这五个“长波”中的每一个也并非对应着一次公认的产业革命，但必须承认的是克里斯托夫·弗里曼和洛克·苏特的这项工作为我们呈现出了技术变革如何推动经济主导基础设施发生重大变迁，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波或周期		主导基础设施的核心特征			
大致时间跨度	康德拉季耶夫波	科学与技术、教育与培训	交通与通讯	能源体系	泛用且廉价的主要生产原料
第一次 1780年代至1840年代	产业革命： 纺织品的工厂化生产	学徒制，干中学， 不同学术意见并存，科学团体	水路，公路	水力	棉花
第二次 1840年代至1890年代	蒸汽动力与铁路时代	专业机械和土木工程师，技术研究 所， 大众基础教育	铁路（铁轨）， 电报	蒸汽动力	煤，铁
第三次 1890年代至1940年代	电力与钢铁时代	工业研发实验室，化学与电气产 品， 国家实验室，标准化实验室	铁路（钢轨）， 电话	电力	钢
第四次 1940年代至1990年代	汽车与合成材料的大 批量生产时代（福特 主义）	大规模的工业研发与国家研发， 高等教育大众化	汽车高速公路， 无线电和电视， 航空	石油	石油、塑料
第五次 1990年代至	微电子和计算机网络 时代	数据网络，全球研发网络， 终身教育与培训	信息高速公路， 数字化网络	天然气， 石油	微电子

图2：连续的技术变革波

根据图2可以归纳总结，我们目前仍然处于第五技术变革波的过程当中。这是之前关于产业革命的论述，对于当前正在兴起的这一轮产业革命，实

际上相关的理论研究并不够系统。过去这些年也涌现出不少从不同角度阐释新产业革命的论述，我在研究当中把这些论述大概归纳为四个视角：能源体系的视角、制造业生产方式变化的视角、技术变革的视角、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

（1）能源体系的视角

从能源体系的视角看待新产业革命，典型的是美国的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他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能源互联网与可再生能源的深度结合，最终将推动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系统，由 5 根支柱构成：能源结构向可再生能源转型；就地收集可再生能源；就地存储可再生能源；建成能源互联网；运输工具上实行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动力车。

（2）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视角

典型代表是英国彼得·马什（Peter Marsh）的《新工业革命》。书中把人类有生产活动以来的制造业生产方式归结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铁器时代开端至 1500 年（延续近 3000 年），阶段特征为少量定制；

第二阶段：1500 年至 1900 年（延续约 400 年），阶段特征为少量标准化生产；

第三阶段：1900 年至 1980 年（延续约 80 年），阶段特征为大批量标准化生产；

第四阶段：1980 年至今，阶段特征为大批量定制；

第五阶段：2000 年至今，阶段特征为个性化量产。

（3）技术变革的视角

以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德国经济学家克劳斯·施瓦布牵头编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代表。在这本书中他提出，每次工业革命都是受到技术革命支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九大类主要技术支持的，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包括大数据及分析、自主型机器人、仿真模拟、水平和垂直系统集成、工业物联网、网络安全、云技术、增材制造、增强现实。

对于新产业革命的阐释，委内瑞拉籍有名的创新经济学家卡萝塔·佩蕾丝近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新产业革命的趋势进行了阐释。实际上，2002 年她

写了《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这本书，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原来的理论体系。他提出，我们现在正处在第五次技术革命中，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新技术的导入期和拓展期，导入期（installation）和拓展期（deployment）中间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往往会伴随着爆发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这样的形式。所以，他认为第五次技术革命正处于导入期和拓展期的中间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转折点。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是转折点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表现，她认为后期通过政府政策的合理引导，信息技术革命会进入它的拓展期，将给整个人类带来二三十年的经济黄金发展期，这是他的一个主要观点。

（4）资本主义发展的视角

通过从不同视角对新产业革命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共识性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一些有关新产业革命特征的东西。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以系统性的科技创新推动工业部门的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发展和服务业的高端化发展。现在正进行的这一轮新产业革命究竟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产业革命，这两种说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根据我的梳理和研究发现，这两种看法的主要分歧在于，德国把始于1970年代并一直延续至今，基于电子与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形成的制造加工自动化过程视为一次独立的产业革命（即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现在开始往后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了。欧盟层面和英语国家则认为，这一过程仅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前奏或开端，而当前正在推进的工业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发展才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容。

研究者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欧盟的新产业战略，所以我只是把新产业革命作为一个背景，并没有在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上做一个明确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区分得那么清楚，我要做的就是要找到这些不同视角的新产业革命的共性。那么，有两个共识：第一个共识是当前这一轮新产业革命尚处于开端阶段，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将亲身参与和见证新产业革命的全面推进，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第二个共识是高度推崇创新，创新政策成为重中之重。所有的论述都认为，在新产业革命时代，科技创新与企业 and 经济增长的比值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而密切，因此促进创新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

2.有关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待工业地位的认识变化

从产业结构定位上看，对工业地位的高度认可或再度重视，是近年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出台新产业战略的一个共同出发点。也就是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工业地位是高度认可的。

二战结束以来，欧盟及其多数成员国对待工业和制造业地位认识的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把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战后到 1980 年代中后期。这个阶段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工业的地位仍然是非常重视的。在 1970 年代，特别是到 1980 年代，欧盟的主要成员国都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德国的轻工业化趋势弱一些，但实际上工业的比重也在大幅下降。实际上，战后到 1980 年代中后期虽然已经出现了去工业化，但是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工业的地位仍是非常重视的。

第二个阶段是 1990 年代初到世纪之交。这个阶段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待工业和制造业认识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去工业化还在加速进行，整个 90 年代欧盟国家的去工业化都比较严重；二是 90 年代是美国克林顿主政时期，美国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欧洲这些国家也普遍认为欧洲的未来在服务业和研发创新，工业和制造业已经不再重要了。也就是说，在整个 1990 年代，工业是不受重视的，甚至是受轻视的。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个阶段再度重视工业，欧洲的竞争力变得比较突出。但是，欧洲国家为什么说欧洲整个的竞争力下降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工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了，工业的竞争力下降了。也就是说，工业是最具有外向型和创新能力的部门，对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和提升竞争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欧盟从巴罗佐委员会开始就很重视产业政策，很重视工业了。

第四个阶段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一阶段把工业和制造业的地位重新提升到了战略层面，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生了一个质变呢？金融危机爆发在金融部门，引起了全球的经济海啸。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对工业和服务业的关系，以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的深刻反思，反思的一个结果就是工业的重要性重新被认可，工业被提升到战略地位。基于这样的变化，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

成员国提出的产业战略都具有推动“再工业化”或者是扭转“去工业化”的意图。比如，欧盟 2012 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reindustrialization）。

我们看下面这张图（如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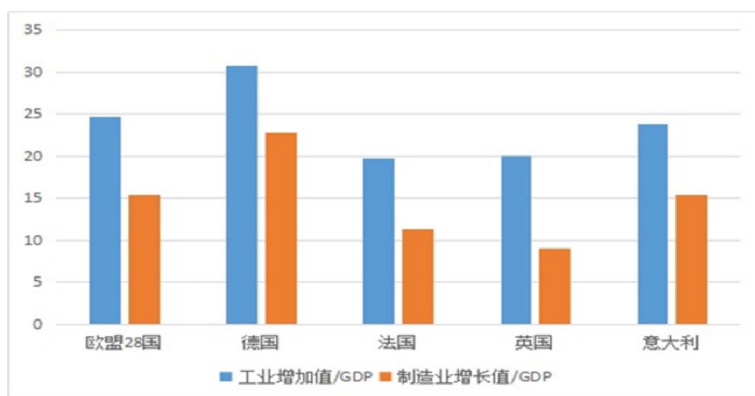


图 3：2012 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这张图是 2012 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这里面是欧盟 28 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柱状图是这些国家和欧盟的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左边的是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右边的是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可以看到，2012 年欧盟提出“再工业化”战略，欧盟制造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约为 15.6%，德国约为 23%，法国约为 12%，英国约为 9%，意大利约为 15%。欧洲提出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把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 15.6% 提升到 20%，2014 年和 2017 年，欧盟分别对“再工业化”战略进行了更新，但是这个目标并没有变化。

德国 2013 年提出工业 4.0，但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再工业化”，2019 年提出“国家工业战略 2030”，就是要把德国制造业的比重从 23% 提升到 25%，实际上也就是“再工业化”。英国和法国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再工业化”，但他们也提出了要扭转“去工业化”。意大利的目标也是扭转“去工业化”，保持工业和制造业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轮新产业战略，要么是明确提出推动“再工业化”，要么是明确提出扭转“去工业化”，所以无论如何都是基于对工业地位的高度重视或再度认可而提出来的。

3. 研发创新政策的重要性

从政策内容和实施框架上看，无论是欧盟“再工业化”战略，还是其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都将促进研发创新及其应用，其相关认识和政策措施也

正在发生值得关注的新变化。

近年来，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在相当大程度上等同于一项大的产业创新政策，因为其中绝大多数政策措施都是围绕如何推动和适应创新而制定的，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过去这些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出台的新产业战略大体上等同于是产业创新战略，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主要是围绕创新而制定和执行的。

欧盟层面，对如何创新、鼓励研发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由集中支持技术研发逐步向支持技术研发与市场化应用并重，乃至更加注重支持研发成果的市场化应用转变，表明欧盟对于创新传导机制的认识在不断调整与转变。原来欧盟大部分对于创新的支持都是基础支持、基础性研究或者是技术研发这个阶段的。这些年开始逐渐向研发成果的市场化应用方面侧重，更多的是在想怎样鼓励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化。这些在近年出台的“欧盟科研框架计划”（“地平线 2020” 科研计划）和“欧洲地平线”这两个计划当中都有明确的体现。

有关成员国促进创新的措施，我在研究当中也做了相应的梳理和观察，总结出成员国都是依据自身政策传统和产业结构的特点，出台相应的促进创新的措施。德国更倾向于为研发创新项目直接提供补贴，而法国和意大利则更偏好于税收减免措施，英国似乎是两种偏好的结合。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逐渐开始关注“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和产业战略”（mission-oriented innovation polic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它作为一种产业政策方式的新探索，正在受到欧盟主要国家的重视，且应用范围正在扩大。

“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指将应对特定挑战或解决特定问题作为使命，以此为导向设计创新政策，包括确定长期目标、跨产业部门合作的机制，以及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形式，等等。

“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是由长期工作和生活英国的著名创新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提出来的。这位女创新经济学家很有意思，这些年非常活跃。她从小出生在意大利，后来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同时拥有意大利和美国双重国籍，但她在美国毕业之后就回到了英国。她长期在英国工作和生活，是一个对美国、欧洲、英国政策都比较了解的创新经济学家，她这些年的研究被

誉为是当今西方创新经济学的领军人物。

她有两个大的观点：

第一，主张政府应该敢于应对大的挑战（think big again）。新自由主义之后，欧洲很多国家都开始不断收缩，很多政府在功能上比较保守，所以她提出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大的问题做大事，敢于在创新中承担风险，创造市场分享收益，而不是简单应对市场失灵。

第二，提出“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据说，“使命导向型的创新政策”是受到了中国产业政策在很多领域发展的启发，结合了中国经验和欧洲的政治体制提出的理论体系。但是，她提出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完全抽象的，而是有一个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简化为“ROAR”理论框架。

R：“路径与方向”（route & direction），政府的政策工具应为创新指明方向。

她提出，在新产业革命快速推进的情况下，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都伴随着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风险，仅仅依靠分散的市场主体难以判断创新的发展方向，此时政府和公共机构在创新的各个环节均能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强调，在经济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政府扮演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是纠正市场失灵的一个角色，但是在新产业革命时期，创新大量涌现，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风险，这时政府应该勇于承担风险。

O：组织机构（organizations），要建立富有探索精神、善于学习和尝试的公共机构。

政府和公共机构不应该怕犯错，应该允许犯错，而且要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使公共机构具备不断从失败中学习，进而调整自己策略的能力。

A：评估（assessment），要构建一套可操作的方法，以评估政府和公共部门在创造市场方面的作用。

政府应该在创新方面指引方向，在创新当中担任相应的角色，有相应的办法对政府的决策进行评估。

R：风险和收益（risks & rewards），指的是应该令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就创新中的风险分担和收益分配达成一致。

政府部门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获得一定份额的风险收益，之后用

来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以减少社会的不公。

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的应用（英国产业战略、欧盟科技框架计划）

总体上来说，“使命导向型产业创新政策”的构想处于完善阶段，至今并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形成完整的实施方案，但已经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认可。

英国在 2017 年提出的产业战略是特雷莎·梅政府提出的产业战略，参考的就是她的框架，并且基于框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四大挑战，即所谓的四个使命。

2018 年 2 月，马祖卡托以欧盟委员会研究和创新总司咨询专家的身份，向该总司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欧盟在研究和创新领域采取“使命导向型政策”。

4. 欧盟版新产业革命进展

当前，欧盟版新产业革命仍处于推进的初级阶段，欧盟层面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主要成员国新产业战略的落实，尚未带来欧洲工业和制造业的全面复兴。

我在评估当中首先对欧盟“再工业化”战略进行了评估，之后又对其成员国提出的产业战略进行了一些评估。我们知道，评估产业政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涉及到的政策工具、目标太多且太复杂，所以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公认的评估产业战略非常成熟的办法。一般来说，我们可以采取比较实用主义的做法，根据他的目标实现是否通畅，战略落实的主要支柱是否稳固来评估。

我做的研究表明，欧盟层面的“再工业化”战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尚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1）欧盟要实现到 2020 年将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提升至 20% 的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其制造业内部结构也未明显优化；

（2）工业投资增势不稳，使得该战略的政策传导渠道不够畅通；欧盟在工业化战略政策传导渠道通过促进工业投资的增长来实现。实际上，2009 年工业投资在希腊欧债危机就已经开始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到 2012 年，一直都有欧债危机的波及，之后好不容易才从欧债危机的漩涡当中走出来。2013 年，欧洲实现了经济复苏，实现了经济正增长。2016 年，英国决定脱欧。“英国脱欧”使大家很不看好欧元区和英国的投资前景，所以工业投资始终处于波动比较大的状态。

（3）公共部门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仍明显“脱节”是造成研发支出增长低

于预期的重要原因，这使得该战略的核心支柱并不稳固；

所谓“脱节”，就是说公共部门搞一套研发，企业搞一套研发，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动和促进，这使整个欧盟的研发支出增长低于预期，也使“再工业化”战略落实的核心支柱并不稳固。

在成员国层面，我分别对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过去几年的工业指标进行了考察，从中可以看出，德国“工业 4.0”战略在落实上确实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整体上看，德国“工业 4.0”在技术上尚处于自动化的深化阶段，在实施范围上主要局限于企业内部，而且德国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不易摆脱“能力陷阱”。首先，在“工业 4.0”方面要建成物理信息系统，所谓的德国版工业互联网实际上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另外，德国工业的结构更多的是在机械设备、化学化工这些领域长期占据优势，人才也都大量涌向这些部门，但在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的其他新兴技术领域的投入始终不够，使其陷入了锁定状态路径依赖，不易摆脱“能力陷阱”。

意大利国家能源战略落实较好，但是在带动整个经济升级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工业 4.0”进展缓慢。根据我的研究和观察，法国和英国的主要工业指标尚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2002 年到 2018 年，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与美国研发支出强度有一些变化。欧盟在 2008 年以后的支出有一些增长，但并不多。到 2018 年，才只有 2%多一点。实际上，欧盟在里斯本战略和 2010 年提出的“欧洲 2020”战略中都提出要把比重提升到 3%。相比之下，德国研发支出强度增长得比较快。尤其 2010 年之后增长更快，已经超过了美国。现在，增长已经达到了 3.11%以上。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增长都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英国不到 2%，意大利不到 1.5%，法国也只是比中国略微高一点点这样的水平。通过这些指标发现，要实现“再工业化”并没有那么容易。

欧盟落实“再工业化”战略和欧盟成员国落实新产业战略不力的主要原因还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拖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触发了欧洲国家开始制定产业战略，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身又成为一个大拖累，使得工业投资上不来，研发创新投资上不来，所以又拖累了“再工业化”战略和其他战略的实施。总之，欧盟由“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由“工业 3.0”

迈向“工业 4.0”，实现整个工业生产模式的转变，并全面协调经济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5. 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演变的新趋势

这部分研究我首先从三个视角梳理了近年来经济学研究的新发展，然后从这三个视角来梳理经济学研究新发展的政策启示，再结合欧盟的实践，看看西欧国家政府进行角色演变有什么新的变化。

1. 经济学研究的新发展

- ①有关“再工业化”和“去工业化”的讨论；
- ②欧美经济学界反思资本主义：反思新自由主义、促进绿色增长；
- ③创新经济学的新发展：理论构建、工业创新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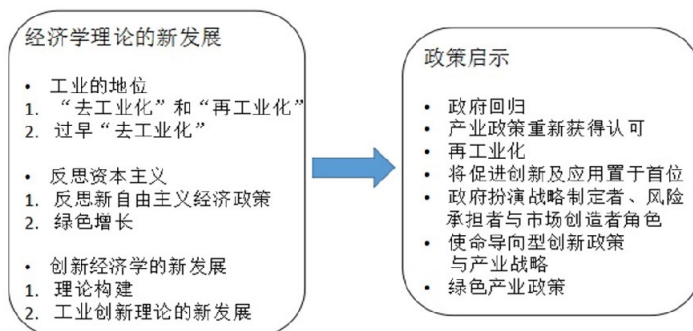


图 4：经济学理论的新发展及其政策启示

图 4 是我梳理的近年来欧盟经济学界理论的新发展及其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回归。政府不能再像原来新自由主义时期那样，政府不仅是扮演一个“守业人”，或者说尽可能减少自己在经济当中的角色，而是要呼唤政府回归，扮演更积极的经济角色。

第二，产业政策重新获得认可。

第三，再工业化。对工业的地位更加重视。

第四，将促进创新及应用置于首位。

第五，政府除了扮演市场失灵的纠正者之外，还应扮演经济战略制定者、风险承担者和市场创造者的角色。

第六，促进绿色增长的产业政策。

用一句话对近几年欧美经济学界的新发展及政策启示做一个总结，就是在后危机和新产业革命时代，政府应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尤其是应重视产业政策，高度重视工业地位，将促进工业和整体经济的创新作为首要任务，以系统性的行动激励私人部门投资，打造以创新驱动的绿色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模式。

从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来看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演变的新趋势，从实践方面看，第一个大的新趋势就是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向经济战略制定者的角色转型。

2. 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的转变：向经济战略制定者转型

简单来说，在西欧国家出现了相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取向的、不同程度的回调，向更加积极主动转型，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再度重视产业政策，除了应对“市场失灵”，政府还开始要求自身具备战略眼光，纷纷制定新的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如图5）

欧盟及其成员国	产业政策与产业战略回归的表现 共同点：对工业地位的高度重视或再度重视
欧盟委员会	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提升，提出“再工业化”，并提升至战略层面
德国	联邦政府首次出台国家高科技战略，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后又提出“国家工业2030战略”
英国	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保守党主导的卡梅伦政府提出产业战略，之后保守党梅政府又提出新产业战略
法国	经济实用主义观念和战略意识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向创新政策转变
意大利	二战后首次提出国家能源战略和工业战略（工业4.0国家计划），由“弱政府”向有为政府转变

图 5：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产业政策与产业战略回归的表现

通过图5可以看到，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共同点是，对工业地位的高度重视或再度重视，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都回归。

欧盟委员会，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欧盟的一个准政府，因为欧盟本质上还是一个国际组织，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德国联邦政府首次出台了国家高科技战略，而且在 2013 年率先提出了“工业 4.0”战略，2019 年又提出“国家工业 2030 战略”。二战以后，德国很少提经济战略，所以他提出这些也是把自身的政府角色开始定位为经济战略制定者。

1980 年代初，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英国率先拥抱新自由主义，而且是自由主义政策贯彻落实的最为积极的一个国家。英国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水、电、天然气的供应行业都已经私有化了，所以英国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思潮最根深蒂固的国家。我们知道，英国的保守党是最不主张政府干预的，但英国提出的产业战略恰恰是由保守党主导的，卡梅伦政府及之后英国是完全由保守党执政的。通过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出，英国的政界对于产业战略，对于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经济角色，在认识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法国一向是主张政府干预的，但过去这些年经济实用主义观念和战略意识进一步强化，产业政策也开始向创新型转变。

意大利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偏弱的政府，二战结束以后，在经济领域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带有战略字眼的经济发展规划。但是，意大利在 2013 年提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2016 年提出“工业 4.0”国家计划。这是意大利从弱政府向有为政府转变的一个表现，意大利政府积极成为了经济战略的制定者。

3. 政府在产业战略中扮演多种角色

除了制定经济和产业发展战略，西欧国家政府在产业战略中还扮演着多种角色：

① 落实产业战略的引导者和协调者。政府要积极引导和协调产业政策的战略，并不是说制定完产业战略就不管了，而是要扮演引导者和协调者。德国提出“工业 4.0”战略之后建了德国“工业 4.0”平台，这个平台是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部长来牵头的，下面又协调了商界工会和学术界的代表，共同组成了“工业 4.0”平台。“工业 4.0”几乎所有的计划项目的审批资助，关于“工业 4.0”方向的确定都是由“工业 4.0”平台来做的，所以政府在当中的协调和引导作用非常清楚。

② 研发创新项目的资金提供者。要大幅增加研发支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

英国。英国由于“去工业化”，研发创新比重非常低，甚至很多年都已经不再提这个指标了。但英国在2017年提出的产业战略中提出，到2027年将英国研发总投入占GDP的比例提升至2.4%。我们知道，德国实际上已经达到了3%多一点。

③支持创新项目的示范性投资者和私人部门的投资合作者。在很多领域，比如海上风电领域，新能源领域，由于风险比较高，所以大多数私人企业是不敢投资的，欧洲国家通过政策性银行做示范性投资者。比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和英国绿色投资银行（GIB），都是国有银行，都要率先投资。其中，有的项目是全资投资，有的是跟私人部门进行合作投资，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和引导私人部门的投资。

④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的积极推动者与推广者。

欧盟在这方面一向是非常擅长的，目前在智能电网、绿色金融、“工业4.0”和物联网方面，都在做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的积极推动者和推广者。

总之，近来西欧国家政府的经济决策旨在通过引导、协调、激励和示范效应等促进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进而推动本国工业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创新。我们看到，西欧国家政府所扮演的这些角色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界限，这是一个新进展。大家有可能会问，西欧国家不是讲究市场竞争原则吗？那现在政府回归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再尊重自由市场了？对此，我也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结论就是，西欧国家政府经济角色的回归是有限度的，这表明西欧国家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发生了重要转变，但并非要否定市场的地位，而是为了扬长避短，引导、激励、协调私人部门，以期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效应，规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导致的投资不足、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

西欧国家的经济理念与政策实践仍处于探索之中，并不是说他回归了就已经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举几个例子，第一，德国“国家工业2030战略”引争议。2019年，德国提出“国家工业2030战略”，虽然该战略是由国家政府部门提出来的，但引起了德国“为总体经济发展提供建议的专家委员会”（我国称为德国“五贤人”委员会）当中的四位经济学家的反对。他们分别公开在报纸或网络上发表反对，认为国家干预过多。第二，2020年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实际上也进一步呼唤了西欧国家政府的回归，在经济社会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疫情当中，尤其在第一波疫情时，欧洲国家显得非常措手不及，政府的作用给人的感觉很不到位。

当前这一轮西欧政府的回归，政府经济决策的发展趋势会发展到什么样子？他的回调相对于新自由主义往左回调，会调到什么程度？会调到哪里呢？我觉得现在还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还在进行当中，那他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何还要取决于实践的检验，取决于回调之后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作用究竟怎么样。

三、对中国的启示与影响

（一）对中国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的启示

1. 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

2016 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中国产业政策进行辩论，争论围绕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展开。林教授主张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张教授则认为中国基本上反对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最后，这场讨论变成了信念之争，所以很难深入下去。

对于中国是否需要产业政策这个问题，我们从欧盟的经验和启示当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据我前面的讲解，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近年来纷纷出台产业政策，实际上体现了他们对政府经济决策认识的反思和转变。

（1）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政府经济角色认识的反思和转变

包括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新理解、对不同层次的政府经济职能的新阐释、对政府在一国的创新风险分担体系中扮演角色的新认知，以及对美国政府在该国创新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再认识等等。

（2）中国否定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不可取

欧洲国家，尤其是我刚才讲的马祖卡托，他对美国的创新政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美国一向向全世界宣扬的竞争基本价值观以及理念，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美国口头上说他们的政府不干预经济，但实际上美国政府在创新体系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现在拥有的一系列信息技术，实际上很多都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早期支持的一些项目，基于这些认识可以发现，欧洲及

其主要成员国出台的新产业战略有很多新的举措。

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是新产业革命时期，国际经济竞争更趋激烈，同时欧美国家政府又回归了。显然，中国完全否定产业政策的合理性是不可取的。比较而言，我更倾向于同意林毅夫的研究结论。他提到，尚未见不使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尚未见不使用产业政策而能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因此不能因为大多数产业政策是失败的，我们就反对所有的产业政策，这样做就是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

（3）需要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2017年，吴敬琏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国内有关产业政策大讨论，他评论说：在中国，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的确，如何基于发达国家产业政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选择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产业政策和战略，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我们需不需要产业政策，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2.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1）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由于中国和欧盟的发展阶段不同，市场经济成熟度偏低，所以政府的角色也不同。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现在的任务是在保证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基础上，追求“更多且更优”的政府。欧盟因为新自由主义导致政府该管的事情没有管，所以现在要“More and better”，但是要在保证市场经济基本理念不变的基础上。

中国：我们还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目标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所以我们未来是在继续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追求“更优的政府”。另外，我们要纠正政府缺位、越位；充分尊重竞争政策，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不同类型的企业，做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越位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命令，行政干预也需要政府推出。

（2）研究与借鉴欧盟及其主要国家促进研发创新及其应用的经验

如果我们借鉴欧洲的经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促进研发创新的方向与领域、政策措施（使命导向型创新政策）、支持手段（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抵免）

方面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这些年我们在这些方面其实已经进步很大了。

（3）警惕“过早去工业化”

警惕“过早去工业化”这一点很重要。几年前，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就已经超过了工业。2017 年，我国研究工业经济比较知名的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并提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制造业实际占比和生产效率增速同时出现下降趋势，说明在理论上、经验上和现实层面都可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同时，我国的“去工业化”思潮空前，并有向全国蔓延的势头。

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对一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就业创新和竞争力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对正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来说至关重要。此外，欧盟落实其新产业战略的经验表明，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实现“再工业化”的难度要远远高于工业化，所以中国工业化战略的选择不应该是“去工业化”，而是应该抓住新产业革命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大机遇，参考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新产业战略，推动工业智能化、绿色化、网络化发展，不断提高工业和制造业的竞争力。

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去工业化”——“再工业化”的历程，且“去工业化”易，“再工业化”难。所以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从一开始就要避免“过早去工业化”。

（二）对中欧经贸关系的影响

我们研究欧洲，最终还是要看他新出台的战略对中欧经贸关系有什么影响。

1. 中欧双方经济竞争性加强

首先体现在制造业上。现在，欧洲也提出“再工业化”，提出重新重视制造业的地位。2015 年，我国提出“中国制造 2025”，实际上我们的竞争性是在增强的。其次，在重点发展领域上，欧洲提出的“再工业化”和“工业 4.0”，跟“中国制造 2025”的很多领域实际上是有交叉重叠的。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我国和欧洲必然会发生竞争。第三，未来中国跟欧洲在尖端科技领域也会发生竞争。

前面我们讲过，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研发支出强度增长不快，而中国这些年追赶速度非常快，已经基本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达到了跟法国接近的水平，

所以未来中欧双方在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也会变得更激烈。

2. 中欧产业合作前景

双方的竞争性加强并不代表双方没有合作的空间，其实中欧产业合作的空间还是很广阔的，这主要因为双方存在较大的互补性。

从发展阶段上看，我们的制造业整体上在技术水平、设计能力、产品质量、节能环保、品牌建设等诸多高附加值环节与欧盟国家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而且中国的经济必然更加开放，中国的制造业必然更加全面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跟欧洲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有比较广阔的合作空间的。也就是说，竞争和合作是同时存在的，竞争并不完全排除合作。

3. 未来加强中欧制造业合作的途径：

（1）鼓励和吸引更多欧洲制造业企业到中国投资

在中国制造业吸引的外资中，来自欧盟国家的比例比较高。因此，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必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中欧产业合作的内容和形式。过去，有一些评论说“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战略是失败的。实际上，“市场换技术”并不是说市场让出去了，技术人家就白白给你了，而是要通过合作来学习、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这些年，我国在制造业方面引进了很多外资，今天已经有一些企业走到了国际前沿，可见引进外资的积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如果没有外资企业在国内市场跟我们的企业竞争，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很难提高得这么快。

从欧盟方面看，他的主要国家都是在“工业 3.0”的基础向“工业 4.0”迈进的。同时，因为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其经济发展前景不明朗，所以他们对 2.0 层次和 3.0 层次的技术转让力度还会加大，因为他们的技术又从 3.0 向 4.0 迈进了。根据苗圩部长的描述，我们大多数技术还在 2.0，小部分在 3.0。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追赶的问题，所以他们淘汰下来的技术或者说不是那么流行的制造业技术，转让给我们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要积极吸引欧洲制造业企业到中国来，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提高我们的技术创新水平。

（2）深挖与欧洲中小企业合作潜力

第二就是深挖与欧洲中小企业合作的潜力。中小企业是欧洲竞争力的主要支撑力量，欧洲制造业存在着大量的隐形冠军。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跟欧洲

中小企业的合作实际上增加了，中国的企业也到欧洲去收购了不少竞争力比较强，但是资金链出现问题的中小企业。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中欧合作、制造业合作，深挖与欧洲中小企业的合作潜力。

（3）引导与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欧投资

从 2013 年开始，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大规模增长，这几年我们也并购了很多企业，尤其是一些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从 2017 年开始，欧洲在限制外资收购企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外国补贴白皮书”。实际上，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针对我国投资收购的。虽然有这样一个总体趋势，但并不代表我们无法收购，因为这需要遵循市场原则。2020 年 4 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企业综合管理局批准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收购德国铁路技术公司福斯罗（Vossloh AG）机车业务的交易。这说明，他们并不是完全把中国的投资拒之门外，而是会选更好更多且更规范的投资。

鉴于欧洲有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他的技术标准和需求也比较高。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循环，对于消费品和工业设备的要求都很高，所以他对产品质量、节能环保、品位档次个性化的追求方面都要求很高。因此，我们的制造业企业进入欧洲市场，也是鞭策企业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良性外部压力。

我们要引导和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对欧投资，虽然说现在难度比之前大，但并不是没有机会。区政府和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积极的信息，通过搭建一些平台来引导和鼓励我们的企业，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投资机会、实现投资过程，进而使这些企业能够参与到欧洲内部的创新系统当中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陈若水

双循环经济学：反周期和逆增长

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 李光斗

摘 要：把握双循环发展格局，是开启中国经济新篇章的必由之路。对企业而言，不仅要做好品牌战略规划，也要发扬企业文化，不断拓展新的商业模式。从用户产生内容的 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到用户产生品牌的 UGB（User Generated Brand），打造企业家的个人 IP，不断促进良性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战略方向引领下，我们要坚持以内循环为主，同时扩大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

关键词：双循环；反周期；逆增长；创新

一、引言

“双循环”是 2020 年一个年度热词，当前我们正面临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格局也产生了新变化。从前，其实很多企业家是搭了中国经济的便车，所以我把以前的增长称之为“搭便车式的增长”。

有这样一个故事：三位成功的中国企业家登上了北京的最高楼，记者问他们是如何上来的？一位说是跑步上来的，一位说是做俯卧撑上来的，还有一位说是揪着自己头发上来的。其实真相是他们乘高速电梯上来的，这个电梯就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就好比乘坐了高铁这一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可一日千里。因此，从前的企业家能够实现财富的增长是搭到两个便车，一个是宏观经济周期，一个是朝阳产业。

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连续 40 年经济增长速度居世界前列（1978—2018 年，年均增长率 9.5%，世界平均增速 6.8%），每八年翻一番：1978 年，中国 GDP 总量为 3679 亿元人民币，1986 年突破 1 万亿元大关；2000 年超过意大利，突破 10 万亿元，居世

界第六；2007 年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2010 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18 年突破 90 万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 9732 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到 2019 年底，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 1 万美元，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最快的国家。尤其是 2020 年，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



图 1：过去 40 年（1978—2018 年）中国 GDP 增速

现在，中国经济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以前是搭便车式的增长，现在我们要实现创新式的增长。创新式的增长体现在五大方面，一是产品创新。通过挖掘新的用户需求，实现消费升级。二是品牌创新。随着互联网线上经济的发展，品牌产生与扩张的速度以及消费者趣味改变的速度，都发生了快速的转向，一个“双十一”会有 10 万个新品牌产生，这时如果再故步自封，就有可能被其他品牌超越，甚至被消费者抛弃。三是商业模式创新。以前餐饮业只注重线下体验，但受互联网经济的影响，现在的餐饮业强调线上和线下的互动，外卖平台甚至控制了流量、利润和口碑。以前选择就餐地点主要靠口口相传的推荐，现在的年轻人主要看点评网站，网上的口碑好，餐厅的客单量和预订量就会大幅度提高。四是管理模式创新。以前是金字塔式的管理，上级压下级，权力层层递进，现在年轻的 00 后已经开始进入职场，管理模式从金字塔式管理转变为群管理。五是营销方式创新。以前是先种草后拔草，现在的年轻人要所见即所得。如今的消费者没有耐心去商场看了东西之后再去购买，而是在网上浏览后即时购买，消费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需要企业家审时度势，研究年轻的消费者的心理与行为倾向，适时转战略战术。

二、双循环经济的内涵

当前，双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的新战略。所谓双循环，是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的主体是内循环，充分发挥中国经济的自体循环力。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高铁里程占了全球高铁总里程 75%以上。“十四五”时期，面对世纪财富大变局，企业家如何去寻找新的财富机会？

改革开放前 40 年，财富机会最早来源于制造业。当时中国处于短缺经济学时代，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更不用说汽车，都是短缺的。所以，只要能把这些物件制造出来，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当产能过剩之后，一味追求制造数量已不能实现财富的增长，这时转变为以“渠道为王”。国美、大中电器、物美等零售业巨头，就是把握住了零售业的财富机会。从超市到大卖场，中国零售商业也有过一段辉煌时期。直至中国加入 WTO，能源创造了新的财富机会。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0 亿人口有 8 亿农民。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开启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已经超过了农业人口的数量。在城市化进程中，获益最大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到后来的资本市场，全球经济下滑，美国股市上升，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出现了逆势增长，而中国的股市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周期，很多大鳄借此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因此改革开放 40 年，从制造业、零售业、能源、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转变，创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财富机会。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过渡的拐点，对于中国经济上半场而言，更多的财富机会来自四大红利：市场经济红利、人口红利、城市化红利和全球化红利。以前中国经济依靠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节省企业用人成本从而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全球制造大国有 220 多种工业品，小到纽扣，大到汽车，都是全球制造数量第一，这些都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三、新财富观

以前的财富是一种物权的财富，其表现形式是实物。原始社会之所以是母系社会且女性地位高，是因为打猎风险大，而农业收成每年比较稳定，所以女性地位高于男性。但是后来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食品加工业，解决了食品储存问题，人可以大幅度地移动。到宋朝时由于商品的流通加快，金属货币不易携带，“交子”这一纸币形式应运而生，此后大量财富可以靠此交换，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

每一次社会进步都会改变财富的表现方式。城市让耕地贬值，拖拉机让牛贬值，汽车让马贬值，虚拟空间让物理空间贬值，互联网让实体经济、重资产贬值。

财富和资本有什么区别？举个例子，买彩票赚了 500 万，如果拿这些钱去买奢侈品、汽车、名牌包，这是一种纯消费行为，只是把这些钱变成了财富或者固定资产，房子是固定资产，汽车、名牌包是移动资产，奢侈品的溢价能力当然也非常高，但是这都属于财富。而投资就是拿钱去办企业，去投资股权。电视剧《三十而已》女主角之一为了打入富人的太太圈，投资买了一个限量版爱马仕，将名牌包变成一种社交密码，借此谈成了一单大生意。此时这个包就由原来的纯消耗品变成了投资品。举个例子，1 万元存到银行，20 年之后利息是 7200 元。但是如果将这 1 万云买茅台的股票，20 年之后就变成了千万富翁。所以，投资就是如何让你赚未来的钱。当然，理财千万不要被割韭菜，要跑赢消费者物价指数（PPI），这叫财富的保值增值。

改革开放后的 40 年，很多企业家从制造业赚取了非常多的财富。比如纯净水行业：工业用水每立方 4.10 元；洗车、纯净水行业，每立方 40 元。一立方水可以装 2000 瓶；每瓶卖一元，就是 2000 元。40 元的成本，可以卖 2000 元。很多富人都是靠卖纯净水这一高利润产品起家。

所谓的创新商业模式，对于创业家来说，就是学会拓展新的商业模式。经济学家最爱讲的故事是在偏僻的山村小 a 和小 b 卖水的故事。小 a 只想着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担水喝，最后自己年老体衰生意也就没有了。而小 b 想到的是在村庄建一条从山泉到村庄的管道，把水直接引到村庄的池子里，与村

长签合同当成自来水卖。虽然曾经面临资金短缺，但是通过融资的手段出让股份，取得各个村的专营权，建立了整个乡村的供水网络，最后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

再举个例子：以前卖煤气罐的生意很好，是因为那时煤气罐奇货可居，但现在随着管道煤气的应用，便不需要笨重的煤气罐了，所以很多公司像新奥燃气靠的就是给各个城市做管道煤气发家致富。所以，营销的真谛就是要出售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艺术家，都要把握正确的财富观。我曾经写过一篇网络热文《为什么梵高是穷死的，而毕加索是富死的？》，梵高生前穷困潦倒，虽然一生画了864张油画、1037张素描，150张水彩，但有生之年只卖出过一幅画《红色的葡萄园》，收入是400法郎。37岁的时候，梵高自杀身亡。相比于梵高，毕加索的人生灿烂辉煌。90岁还在办画展，是唯一一位活着看到自己作品被卢浮宫收藏的画家。在其91岁辞世时，毕加索留下了7万多幅画作、数幢豪宅和巨额现金。据测算，毕加索的遗产总值达到395亿元人民币之巨。同样是画家，为什么毕加索会如此之富有？

原来，毕加索不仅是个绘画天才，更是位会讲故事的营销天才。毕加索要出售他的每一幅画之前，都会先办画展，召集大批熟识的画商来听他讲故事。如果仅仅只是一幅画，恐怕没人愿意为它付出高价。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因为有这一兴趣，故事就值钱了，故事里的画也就值钱了。这是一种产品“货币化”的过程，很多人不明就里，而天才的毕加索却深谙此道。如今，价格昂贵的产品无不是有着生动的品牌故事，而且这些品牌故事每天还在被创新地演绎。

据说，毕加索出名之后，即使购买很小件的生活用品也喜欢用支票付款。因为毕加索认为，店主与其拿着这张支票去银行兑换那么小额的现金，倒不如将这张有着毕加索亲笔签名的支票当作艺术品，装裱收藏起来，说不定以后还能升值卖出去。于是，为了不花钱也能购物，毕加索就用支票去结账，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名人“刷脸”。毕加索说，“我画的不是事物的表象，而是不能用肉眼看出的本质。”梵高穷的原因在于有生之年无法实现与他人的价值共享，而毕加索生前就实现了品牌溢价。

四、互联网下半场的新发展趋势

第一，品牌年轻化。我们必须要和年轻的消费者沟通，满足其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第二，资源无限化。以前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年罗马俱乐部曾经做过一个预言，石油只够用 100 年，地球将毁于资源枯竭。但是，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随处可见新能源汽车。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甚至出现过负油价，油桶比油还贵。所以，石油问题不会阻碍人类的发展，人类总是能在旧资源枯竭之前找到新的能源。

第三，资产无形化。以前大家注重房子、土地等有形资产，现在任正非说最值钱的是大脑里的石油，这叫资产无形化。最值钱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品牌。可口可乐的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哪怕一夜之间全世界的工厂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只要可口可乐这个品牌存在，很快就能东山再起”。这就是资产无形化，只有有品牌效应，银行仍然会贷款，供应商仍会送来原材料上门，经销商也仍旧会等待下线的产品。

第四，客户资源化。以苹果公司为例，一旦购买了苹果手机，用户的电话费、下载的 APP、使用的流量、手机导航等等，苹果公司都赚钱，客户成为苹果公司的一个资源入口。

第五，竞争多维化。移动通信以前很牛，微信做了一个拦截；银行以前很牛，支付宝也做了一个拦截，所以，竞争最后干掉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突然出现一个降维打击。就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描绘的场景，别人把你变成一张相片挂在墙上，把你从三维世界变成了二维世界，而别人甚至是四维世界，可以自由地穿梭在过去和现在之间。

在经济内循环背景下，外贸出口、国际旅游、出国留学、线下培训、电影娱乐等行业都会面临挑战，但是也会给很多行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学会转移阵地、断臂求生、降本增效、创新增长，寻找到新的增长曲线。

五、中国经济下半场的造富机会

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推动三个转变：第一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第二是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的转变；第三是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首先我们分析这三个转变带来的造富机会。

中国前 40 年处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现在我们要追求质量、追求创造、追求品牌，我们既要有思想自信，也要有品牌自信。现在进入国货回潮时期，国人慢慢地开始对本土品牌产生信心，我们在家电领域可以说已经完全战胜了欧美的品牌。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和年轻化制造转变，也会诞生新的财富机会。现在 80 后、90 后乃至 00 后对国潮品牌的热情更高，年轻一代出现新的消费趋势，例如小米提出“一人家电”的新家电概念，因为年轻消费者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改变。

另外，还有资源的升级换代会带来新的财富机会。从以前的煤老板变成现在的水老板，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对于喝的水非常讲究。还有银发经济，现在中国老年人口是 2.49 亿，已经超过了欧洲，尤其北京这样的城市，60 岁以上的老人很快就要超过户籍人口的 50%。到 2050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4.87 亿，老龄化现象极其严重。

4G 带来了什么？直播、短视频、移动支付、滴滴、饿了么、新零售等。5G 将会带来哪些商机？万物互联、无人驾驶、远程医疗、远程教学、新家庭影院、虚拟社交等。这些财富机会将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重振实体经济……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也是发展的核心。

用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目标。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八个科技前沿领域成未来 5 年发展重点。中国将积极推动“新基建”，包括了 AI、5G、大数据、半导体、区块链、量子科技等高科技领域的创新发展，并通过发展高精尖技术，实现弯道超车，取得全球领先地位。

互联网数字经济也将迎来快速发展。中国将成为世界上首个广泛发行和使用数字货币的大国。

以内循环为主，就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米面粮油企业将会成为新的上市公司。“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到 2022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14%；2050 年，中国老龄化将达到峰值，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 27.9%。延迟退休不再是一个讨论话题，将会付诸实施。民生衣食住行包括餐饮、国内旅游、教育、养老、医疗卫生、大健康等行业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十四五”期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将有较大改变。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日前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意味着十四五期间将会彻底放弃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而是实行全面放开鼓励生育政策。婴儿潮不会很快来临，但幼育、幼教以及国产婴儿配方奶粉、食品、服装、玩具等婴童产业等将会得到政策鼓励和快速发展。

“十四五”期间，中国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十四五规划”提出租购并举、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地产行业仍有巨大发展空间，仍处于朝阳产业。

对“十四五”期间的一大战略判断，是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是主题。这意味着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投资拉动持续发展经济，并推进一系列重大世纪工程的开工建设：包括“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国家水网、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星际探测、北斗产业化”等。四川成都至西藏拉萨的川藏铁路已正式开工，将在“十四五”期间全面进入建设高潮，并在 2026 年全线贯通。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在“十四五”期间也会有实质推进。传统铁（路）、公（路）、基（建）大有可为。

加强练兵备战，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政策将使中国的军工企业、军民融合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

在新的发展机遇期，如何突破增长的极限？要善于寻找第二增长曲线。第二增长曲线是伦敦商学院的创始人、英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查尔斯·汉迪提出的，它告诉我们任何一条增长曲线都会滑过抛物线的顶点（增长的极限），持续增长的秘密是在第一条曲线消失之前开始一条新的 S 曲线。“当人人都知道到该往向何处时，你往往已经没有了机会走了。”所以，我们要有先见之明，学会另

起一行反周期操作。

企业家要有两个能力，一个是讲故事的能力，另一个是卖梦想的能力。

小米创立 5 年时估值增长了 180 倍，雷军这样算小米的估值：“小米有 7000 万用户，每个用户的价值 380 美元，这样算下来，小米市值近 300 亿美元”。雷军就是用“市梦率”来计算。企业家要不断地创造新梦想。创立特斯拉的马斯克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市梦率”的企业家，他被誉为乔布斯真正的传人，创造想象力经济。

六、如何突破增长的极限

企业发展的核心是要形成综合竞争力。可口可乐在和百事可乐的竞争过程中，为了 1% 的市场占有率消耗几十亿的广告费。1983 年，郭思达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可口可乐在美国软饮市场占有率第一，在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 35.9%，但正是这样的高占有率，让它增长乏力。但郭思达认为：世界上每人平均一天要消耗 64 盎司水，可口可乐仅占 2 盎司，虽然我们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35.9%，但在消费者胃里的份额仅为 3.125%，未来机会无限！可口可乐开始实施“基于胃部扩张的战略”，从可乐进入纯净水、咖啡、茶饮料、运动饮料等领域，这也是可口可乐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可口可乐总裁郭思达有两句名言，“我们要占领的不是可乐市场，而是消费者的胃。”“调动每一盎司的力量，让这个世界著名品牌创造更多的财富。”

“定位”理论虽好，但墨守成规的“定位”也定死了很多企业。

有些企业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在中国经营最成功的超市大润发，是一个中国台湾的企业家到大陆苦心经营的成果，他把大润发开遍了中国的一级、二级市场，但最后他彻底出局了。打败大润发的就是马云的阿里巴巴，2017 年大润发被阿里巴巴收购时，大润发创始人说过一句话：我们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当年诺基亚提出科技以人为本，诺基亚 CEO 在公司破产的新闻发布会上失声痛哭，他说自己没有干错任何事，但不知道为什么输了。因为他输给了苹果，诺基亚卖的是一部通讯工具，而苹果卖的实质是移动的手机。

学习心得

突破消费者的心障，既要满足消费者的既有需求，又善于发现消费者的新需求，还要善于创造新需求，寻找增长的第二曲线，实现全系增长。因此，全系增长就是从卖产品到卖品类再到卖生活方式；然后重新定义产品、品牌、服务，甚至是重新定义商业生态以及重塑平台，从核心竞争力发展到综合竞争力。

国土有边界，但市场没有。维珍（VIRGIN）起家于《学生》杂志，邮购录音带，现在维珍品牌旗下拥有两百家私有公司，其商业帝国跨越空运、服装、软性饮料（维珍可乐在欧洲销量超过百事可乐）、计算机游戏、电信运营、金融服务、唱片、夜总会甚至包括安全套等各行各业。

塔可钟最初的市场定位是墨西哥餐厅，而新首席执行官约翰·马丁上任后，将塔可钟市场边界重新定义为：快餐餐厅服务。不仅市场范围拓宽了，对标的企业也增多了。但塔可钟的市场边界并未仅限于此，为了在市场中实现增长，塔可钟彻底颠覆了形象，对餐厅从厨房设计到管理结构进行了全面调整，马丁又重新定义边界，从快餐餐厅到“喂饱人们”。做到了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塔可钟便宜实惠的快餐，所以在机场、商场、杂货亭、便利店等场所都可见到塔可钟。

特斯拉汽车作为 2020 年销售增长最快的汽车品牌，也是实现了全系的发展。2019 年 10 月，马斯克宣布特斯拉推出一项汽车保险产品：“这款产品将比目前市场上低 30%”。

耐克以前是卖篮球鞋的，运动鞋服一体，而近年来女性用户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男性用户。耐克财报（2018-2019.5.31）显示其女性业务的营收达 73.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这也是自 2017 财年以来，耐克女性（2014NIKE WOMEN）业务再次回归双位数增长。耐克首席财务官 Andy Champion 透露：女性运动市场的潜在体量至少是男性市场的 1.5 倍，“但目前耐克的女性业务仅仅占到总营收的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希望改变。这个现状。”因此，通过细分市场帮助耐克公司成功实现了转型。接下来耐克将不断扩张市场边界，细分网球市场、健身市场等，业务范围涵盖和运动健身有关的一切事物，产品从跑鞋、球鞋、运动服、内衣到冰球棒等，甚至成为体育经纪人，开始管理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如果你要想知道请哪一个运动员做你的代言人，最好的办法就是问耐克，因为耐克拥有所有运动员的大数据，包括参加了多少次比赛，成绩如何，未来

的成长空间，黄金生涯何时开始，峰值在哪里。大数据为耐克带来了升级。未来耐克的新产品就是软硬结合。鞋里装有一个芯片，每天走多少步都可以在朋友圈分享，不用再借助手机或手表计步。所以别人卖的是运动鞋，耐克卖的是运动。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强调聚焦擅长和熟悉的领域，做好分内的事。AT&T 的核心竞争力是长途电话网，曾占据了美国长途电话业务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而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不仅是通话，更需要语音、视频、数据传输和价值传输等功能。

时代更迭速度变快，产品淘汰的速度也加快，谁也不能保证今天流行的事物，明天依旧流行，变化是为准备好的人们带来机遇。

同样的道理，PC 为什么衰落？比尔·盖茨告诉我们的消费者更需要“能说、能听、能看、能学的电脑。”因此，企业要想突破增长的极限，就要打破常规，突破理论的桎梏和思维的局限，不能被现有的核心竞争力拖累，不断更新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不被消费者厌弃，不被时代抛弃。

七、经济内循环下会迎来第二春的行业

首先，互联网——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在线支付、电商平台等都会迎来大发展，而刚需产业——餐饮食品、养猪、种菜也会有这种新的风口。因为疫情影响，出国留学受阻，那么国内教育事业将有大的发展。好学校一位难求，甚至幼儿园的竞争都非常激烈。还有监控安防、位置定位、人脸识别、北斗导航、5G 等行业都会迎来第二春。

未来不仅是互联网+，还会出现新的房地产+。在后疫情时代，中国消费者的民族自信心也会明显增强，中国原创品牌崛起。

影响未来的三大技术是：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和数据经济时代（DT）。人工智能包括：VR 虚拟现实技术、AR 增强现实技术和 MR 混合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已经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经济效益，未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贡献更是不可估量。人工智能将使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变。数字技术时代，5G、物联网和区块链联袂而来，未来的发展将比人们想象的更迅速、更快捷。

所以商业模式要创新，从产品供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以服务卖产品和以产品卖服务相互赋能，形成一种不断正向的双循环。

八、如何创新商业模式

内循环战略下，企业如何创新商业模式？举个例子，一个农民进城一开始是种树。慢慢种树之后，他发现有一个产业比种树高一个维度，不只是种树、种草，还有盆景等各种各样的景观，这就是园林绿化。营造园林变成了环境艺术。环境艺术要首先设计方案，设计费按平方米计算。现在我国很多的园林公司、环境艺术公司都成了上市公司，而且发展空间特别大。以前人们只注重装修自己的房子，现在人们发现城市要有城市的“客厅”，这些就要靠园林公司、绿化公司、环境公司来解决。

IBM 公司以前是单纯地卖产品，包括电脑、大型机、PC 机等，后来变成卖四海一家的解决之道，推出“智慧地球”战略。IBM 正在从一个硬件公司到卖解决方案的公司，拥有最多的咨询人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智库。

新营销是什么？品牌小众化、个性化、定制化。

从 UGC 到 UGB，现在有个词叫“内容经济”。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一代的消费者都愿意购买视频网站的会员，从而自动跳过广告直接观看视频。而内容经济就是要把广告变成一档和消费者互动的节目。《奇葩说》《脱口秀大会》等综艺节目就成功地把广告植入到节目之中，甚至广告词也是由这些节目制作公司来设计，所以叫用户产生内容（UGC）。

为什么传统媒体濒临危机，因为传统媒体不仅需要发稿费，还需要审查作者投稿。而新媒体是机器审核，用户看到了好的内容甚至突发性的新闻，就可以上传到平台上，无论微信、微博，还是 b 站、今日头条，都是一个用户产生内容的。百度大力强推广它的百家号，每个人都是内容的生产商，而且还不付工资，“不用扬鞭自奋蹄”，这叫用户产生品牌（UGB）。

未来的生产是柔性生产。我参观过一家数字化生产线，每一条生产线上生产的衣服，服装的面料、颜色甚至尺码都是不一样的，以前是大工业化的生产，产品标准化。而现在的数字化生产都是根据客户的订单来生产顾客喜欢的产品，

每一件西服款式、扣子都不一样。所以，未来的生产是一种新的智能化生产。

直播带货是新的销售渠道。2020 年直播带货异常火爆，过去“一铺养三代”，如今“带货一哥”李佳琦 2019 年赚了 2 亿元、李子柒赚了 1.6 亿元。而以 2018 年的净利润来看，有 2307 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低于 2 亿元。一个网红一年的利润超过了 60% 的上市公司。淘宝达人收入排行榜“淘布斯”：32 岁的女主播薇娅年收入 3000 万元、带货销售额 7 亿元位居榜首。

创意经济，即重新发明产品。创意经济是英国提出来的，例如以前雀巢咖啡是老大，如今星巴克重新发明了咖啡，提出了一个“第三空间”理论，把它的连锁店开遍了全世界，而苹果重新发明个人电脑 IPAD 和移动电话 IPHONE。

创新的力量还体现在文创产业。熊本熊为日本的熊本县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上千亿。2019 年夏天，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票房高达 50 亿，年轻人娱乐消费的趋势不可抵挡。品牌年轻化带来的是整个品牌的焕然一新以及价值的赋能，其实是为实体经济赋能。我们最近在做文创产品的开发，包括文具、食品、杯碟，甚至茶叶都可以用中国的生肖形象为它赋能。

九、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品牌。为什么故事营销能为产品带来更大的价值？这里讲《故事营销》中的一个小故事：一块石头最多能卖多少钱？

一个小和尚看到师父有一块珍藏多年的石头，便问师父这块石头值多少钱，师父说：“我自己捡来收藏的，一直不知道价格，你明天去帮我测一下吧？”第一天小和尚去了菜市场，一位农妇觉得这块石头适合腌菜，问价后看小和尚竖起了两指，她便给出 20 元的价格，小和尚没有卖，直接抱回去了；第二天小和尚去了石雕市场，一位雕刻大师觉得这块石头适合雕刻神像，问价后看小和尚竖起了两指，表示愿意以 2000 元的价格买下它，小和尚依旧抱着石头回去了；第三天小和尚按照师父的安排去了奇石市场，结果那些玩奇石、字画、古玩的行家们一下子就围了过来，个个对石头的天然绝妙赞不绝口，大家争先恐后地想购买，一个比一个报价高，他们见小和尚竖起了两指，有人愿意出价 20 万买下，小和尚吓呆了，他赶紧抱着石头跑回家告诉师父，师父笑着对他说：“你

问我它值多少钱，不同的市场会给出不同的价格，要想体现最大价值，只能遇到识货有缘的行家。”

所以，要让对方开价，你一开价，就输了。讲一个好故事，就是为品牌赋能。制造稀缺、营造氛围、推高升值。

要营造氛围。LV 的包在地摊上也卖不到好价钱，所以奢侈品一定是在五星级商场最好的店铺，因为里面的服务员可以做到一对一服务，所以我们看奢侈品就知道什么叫高于品牌。

讲品牌的故事要对比事实、挑动情绪，还要有反差和一波三折。我们看网上的网友非常有才，“你写 ppt 时，别人在旅行；你看报表时，别人在旅行；你挤进地铁时，别人在旅行；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别人在旅行。”这是在陈述事实。

“你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盘旋云端；你在会议中吵架时，尼泊尔的背包客端起酒杯坐在火堆旁。”听完了这句话，你就会产生“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冲动。所以，这就叫挑动情绪。

卖故事好过卖方案，“向年轻人卖情怀，向中年人卖焦虑，向游客卖传奇，向女人卖美丽，向老年人卖恐惧，向所有人卖萌”。

什么叫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核心是盈利模式要简单、可复制、有想象力，还要赋予互联网的基因。新时代的商业模式要怎么来做？

分众传媒能上市，就是观察到人们在等电梯时，会产生无聊经济，人的眼睛无处安放，只能看墙上的海报、视频广告。该公司一下子就把以前人们围在一起看晚会的场景转换成了白领等电梯的场景，而且等电梯的这些人是最有活力、最有消费潜力的群体，于是这家企业成功实现了上市。分众传媒的成功上市显示出国际资本对楼宇视频这一新兴媒体的认同，也表现了这一行业的快速成长性令人刮目相看。

中国的企业以前总是比谁的产品卖得便宜，但是外国的企业比的是谁会讲故事。世界上卖得最好的水是依云水。100 年前有一个法国的贵族得了肾结石，将不久于人世，但是他回到家乡，天天喝阿尔卑斯山脚下自涌的矿泉，半年之后结石消失了，他把它献给了拿破仑三世波拿巴皇帝，波拿巴皇帝给它命名为依云，自此依云成了全世界卖得最好的水，占全球销量的 10%，它的利润超过

了中国石油、水厂的总和。

为什么依云的矿泉水能够卖那么贵？就是因为像依云这种高端瓶装水品牌在营销策略上都不约而同地举起讲故事的大旗，为产品添加传奇、浪漫或者神秘元素。尤其是独一无二的水源地，独一无二的故事，构成了每个品牌不同的故事体系。

中国不缺水，但是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75%的水源都在青藏高原，而且没有任何污染的，欧洲的水都是经过工业革命先污染后治理的。当西藏的企业家找到我咨询时，我说你为什么不卖水？一语点醒梦中人，他把西藏的水取名为 5100 西藏冰川矿泉水，5100 意即海拔 5100 米以上的水。西藏 5100 冰川矿泉水公司明年要推出海拔 6100 米的水。现在，西藏珠峰冰川的天然矿泉水卖得比依云还贵，我们给它做的宣传广告是“世界之巅、圣水之源”。每天都在世界上最高的机场——拉萨贡嘎机场的候机廊桥上做广告，现在 5100 西藏冰川矿泉水已经成为所有重要场合，甚至招待外宾时的饮用水。

一个成功品牌的形成过程，就是故事内化为产品的过程，而此时消费者通过购买获得的，不只是产品的物质形态，更多的是品牌故事带来的情感体验，即使需要支付高价才能获得，也会心甘情愿。这就是故事带来的品牌溢价。

水果能不能讲故事？一只橙子的价格能不能比普通的橙子高出 10 倍？1996 年，68 岁的褚时健入狱，71 岁被判无期，坐牢 6 年后保外就医。出狱后，70 多岁的褚时健是如何把褚橙做成全国性的品牌呢？褚橙是从赣南引进的脐橙，经过优化培育，有 24: 1 的最佳黄金酸甜比，但是当初褚橙销售并不好，宣传就是在商场里打了一个横幅写上“褚时健种的冰糖橙”。后来，褚橙的广告文案变成“人生总有起伏，精神终可传承。”“承”是什么？既是承接的承，也是褚橙的“橙”的谐音，一下子打动了消费者，变成了一种励志橙。2012 年，褚橙借助本来生活上线电商平台，卖了 200 吨。此后两年各卖出 1500 吨，“励志橙”就此一炮打响，红遍全国。

十、5G 时代对房地产的影响

在双循环模式下，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商业时代，城市化仍然是未来中

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而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郊区化发展也是一个大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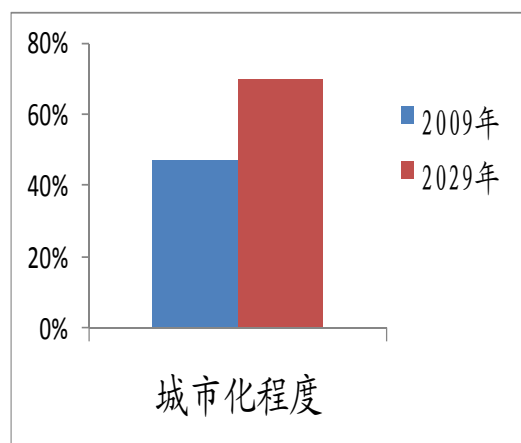


图 2：城市化程度

“城市化”进程将成为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住宅状况逐渐趋向于郊区化。目前在中国，超过 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城市和农村的人口比例是 50.32%: 49.68%，二十年后，将会有 77%的人进驻城市，人们会从城市的中心渐渐移居到城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迎接地产多元化的时代？未来的地产是教育类地产、娱乐类地产、景观类地产、度假类地产、体育类地产、工业类地产、房地产+，所以，新的房地产+将迎来一个多元化的房地产时代。

教育类地产。美国房地产的价值主要看附近学校的价值，以前大家没有意识到学区房的价值，西城区的房子之所以卖得最贵，是因为西城区的好学校最多，所以这也就是教育类地产所迎来的一个发展。

娱乐类地产。例如，一个地区有环球影城开业，它旁边的房子增值就会非常快。在美国，迪斯尼所在的城市，房价总是比别的城市高。

体育类地产。有一家公司叫奥林匹克公园地产，它把体育当作小区的传播和建造主题，爱好体育的消费者全都聚集在这里了。

工业类地产。华为的总部以前在深圳，后来搬到东莞松山湖，一下子带动了整个东莞房地产业的发展，所以地产的多元化将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机会。地产也讲究跨界和产品的创新，华润联合小米在北京昌平沙河拿地 13 万平米，用来建设新的科技智能化的地产。

房地产+。高尔夫球场的落成，最终目标在于周边别墅项目的开发。主题公园、主题酒店、主题地产、主题商业和主题工业园区，还有居民和文化教育设施，都会带来土地的升值。

商业地产的新盈利模式就是聚集人流量，房地产的价值会随着人流量提升。最近，一些三四线城市热衷于搞网红直播基地，这就是一种新的流量入口。通过让网红卖东西带来人流，物流也会随之而来，就可以坐享土地升值，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论坛经济。一个论坛往往可以使宾客云集，土地升值，最终让城市升值。博鳌曾经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镇。在中国的地图上，没有它的标记；在海南省的地图上，它也不过是标有锚和鱼的小点。之所以在一夜之间令世界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其有优美得足以与法国蓝色海岸媲美的景色；更是由于他懂得插位，博鳌以亚洲论坛的营销聚焦了世界的目光，知名度在短时间内急剧蹿升，成为一夜之城。因为这里诞生了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面向亚洲同时也面向世界的高层次论坛。

城市管理的创新。三亚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在城市建设上另辟蹊径。很多的城市在做体育产业，三亚当时把三大选美盛事都落户在此。我曾经为《三亚晨报》写过一篇文章《以美丽经济塑造城市品牌》，自然风光的美再加上选美经济，一下子就振兴了三亚的旅游产业。

气候也是一种竞争力。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为寒冷的地方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张家口将会成为北京奥运会的联合主办地，哈尔滨也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把握双循环发展格局，开启中国经济新篇章。对于企业来说，我们既要有品牌战略规划，也要把企业文化发扬光大，不断拓展新的商业模式。从用户产生内容的 UGC 到用户产生品牌的 UGB，打造企业家的个人 IP，不断形成良性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双循环的战略方向引领下，我们要坚持以内循环为主，同时扩大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周期。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肖丽芬

什么是中国版数字货币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马若微

摘 要：2017 年，国际清算组织 BIS 提出“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 CBDC）的概念，CBDC 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但是，各国央行在推进数字货币的研发与应用实践方面的进展和态度不一，目前，多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发行在即。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起步较早：2014 年，我国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2019 年底，我国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DC/EP 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对外宣布，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将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 2022 年的冬奥会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并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

关键词：数字货币；人民币；数字化；流通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正加速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并引发了金融的数字化变革。2019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指出：“区块链技术应用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其中，推进数字金融和数字资产交易的关键环节是货币的数字化。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以其去中心化、透明度高、成本低、安全和匿名等特点快速发展，据统计网站 [coin market cap.com](https://coinmarketcap.com) 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天都有各种形式的数字货币在发行，总量已经超过 5500 种。私人数字货币的泛滥冲击着各国的金融稳定，也给监管领域造成困扰，同时给法定货币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对此现象高度重视并积极研究应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设计、决策和是否发行成为各国央行目前最为紧迫的工作，央行数字货币成为未来世界货币竞争的焦点。

2017 年，国际清算组织 BIS 提出“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简称 CBDC）的概念，CBDC 受到国内国际广泛的关注。但是，各国

央行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与应用实践方面的进展和态度不一，目前，多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发行在即。我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起步较早：2014 年，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2019 年底，我国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 DC/EP 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2020 年 4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对外宣布，我国央行数字货币将先行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 2022 年的冬奥会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并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2020 年 10 月，深圳市政府联合央行开展央行数字货币红包试点，以抽签的形式，面向 5 万名市民发放数字人民币。首次亮相的数字人民币面值为 200 元，设计与纸钞相似，上方左右两处分别印有“国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图样。

目前，各国推动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举措更加积极，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每天都有新动态、新举措。2020 年 7 月 23 日，立陶宛中央银行宣称发行了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 LBCOIN，吸引了全球的高度关注，将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推到新阶段。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提速，再次让我们意识到，对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是数字经济、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数字技术条件下金融、货币变革的必然选择。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这已不是是否研究、是否推行的问题，而是需要加快研究、加紧研发、加速实施的问题。其次，央行数字货币的出现不是简单的货币形式的改变和支付工具的替代，而是一场新的货币革命（战争）。百年一变的货币革命将对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迫切需要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观察与总结。最后，央行数字货币革命开启了一场开放经济下的大国博弈，事关国家战略布局、国际经济秩序的变化和世界新格局的演化，迫切需要学术界加紧研究，为国家决策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字人民币与虚拟货币的区别

对于数字人民币的最新定义，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指出，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由指定运营机构参与运营并向公众兑换，以广义账户体系为基础，支持银行账户松耦合功能，与纸钞硬币等价，具有价值特征和法偿性，支持可控匿名。其中包含两个重点：一是数字人民币是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二是和纸钞、硬币等价，数字人民币

主要定位于 M0，也就是流通中的现钞和硬币。

虚拟货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虚拟货币泛指一切非实体形式存在的 token；而狭义的虚拟货币是指由虚拟社群经营主体发行，仅限于在某些虚拟环境中流通的 token。根据欧洲中央银行定义，虚拟货币是一种未加监管，由其开发者发行和控制，被某一特定虚拟社区成员使用并接受的数字货币。自 2008 年比特币出现以来，一般提到虚拟货币通常特指比特币、以太币等去中心化加密货币。此类虚拟货币随着近两年比特币价格暴涨后的财富效应引发许多人对各种虚拟货币狂热追捧。数字人民币与虚拟货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区分：

（一）发行主体

数字人民币由我国的货币当局即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发行的数量由我国货币当局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视情况而定；虚拟货币由私人部门发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货币。发行数量完全受虚拟货币发行商的意愿控制，可以由平台无限量发行。

（二）适用范围

数字人民币的适用范围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一般不做限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做到全球流通；虚拟货币只能在指定平台进行流通，应用于特定场景，中国大陆虚拟货币通常指运行在网络上的货币，知名的虚拟货币如腾讯公司的 Q 币，另外网络游戏亦用虚拟货币。虚拟货币通常用于用户购买网络上的虚拟服务，如腾讯公司的 Q 币可以购买 QQ 会员功能、网络游戏的装备等。虚拟货币通常是用户缴费手段。即便是受到全球追捧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也只能在特定场景使用，如在所谓“暗网”上的平台交易支付、特定平台上的投机行为等。

（三）流通方式

数字人民币是一种双向流通方式，数字人民币与纸钞一样是法定货币，两者之间可以 1:1 双向兑换，而且数字人民币打破系统壁垒，可在所有系统之间自由流通；虚拟货币则是一种单向流动方式，虚拟货币可由法定货币购买，但无法通过官方渠道反向兑换法定货币。如 2009 年，我国文化部定义虚拟货币为：由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发行，游戏用户使用法定货币按一定比例直接或间接购买，存在于游戏程式之外，以电磁记录方式存储于网络游戏运营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器内，并以特定数位单位表现的一种虚拟兑换工具。根据我国现行规定，公众用法币购买的网络虚拟货币只能在某些特定平台内流通，不可跨平台使用、不

可用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兑换人民币，即虚拟货币不可赎回。如游戏玩家想要在游戏中买装备和道具来提升游戏体验，就需要先利用人民币进行充值，游戏中一些好看的限定的衣服、枪械里炫酷的皮肤需要玩家先花钱买点券，再用点券兑换喜欢的衣服等，通常点券买得越多越优惠，这个点券就符合虚拟货币的概念。一些直播平台的打赏也是如此，2019年，法制网曾报道某直播平台的48个“僵尸”账号内竟凭空多出了价值96万余元的虚拟货币，随后这些虚拟币又陆续以直播间“打赏”的方式转入特定主播的账户，这一系列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实则是该直播平台的程序员李某为谋私利动起的“歪脑筋”。

（四）货币价值

数字人民币等同于法币，一个一元的数字人民币与一元的人民币纸币是等同的；而虚拟货币与法币价值不对等，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的兑换率处于持续波动状态，价格不稳定。2017年12月，比特币首次突破1.9万美元关口，一年后暴跌至3200美元左右。据法新社伦敦2021年1月7日报道，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4万美元关口，在短短5天内飙升1万美元。英国一个名叫詹姆斯的程序员，自2009年开始挖矿比特币，在四年的时间里收获了7500枚比特币，按照当前的价值换算，他已经身价3亿美元了，但戏剧性的是，詹姆斯却在2013年弄丢了电脑硬盘，如今3亿财富密码深埋地下垃圾堆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拥有者会将虚拟货币放入某个交易平台的钱包之中，为了保证安全，平台的账号密码十分复杂，甚至拥有多个密钥，比如公司密钥、活跃密钥、拥有者密钥、备注密钥等。由于密钥均为电脑随机生成，长度高达51位，混合了数字、大小写字母，普通人难以记忆，往往会将密钥存储于电脑硬盘，再用加密软件覆盖，又或者直接打印，放入保险柜。于是，7500个比特币在平台账户中无法操作，除非詹姆斯将深埋于地下垃圾堆的电脑硬盘挖出、修复硬盘、获得密钥，3亿美元的财富才能重见天日。

（五）信用保障

数字人民币依托于国家信用，其信用与人民币等同，国家信用的上限即为数字人民币的上限，因此，其是信用等级最高的货币，币值也具有天然稳定性，并且政府和中央银行会根据经济的发展水平对其发行数量进行宏观调控，保证了公众对法定数字货币信心。虚拟货币则没有国家信用支持，也没有真实资产担保，币值波动剧烈，呈现很大不稳定性。虚拟货币的信用支撑来自于私人部门自身，如果失去私人部门开设的账户或者私人部门倒闭，那么该私人部门支

撑的虚拟货币也将相应地烟消云散。

（六）技术选择

虽然各国现有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大多围绕着分布式账本技术展开，并积极讨论其可行性和效率，但各国央行也对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有所顾虑。事实上，在现有条件下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潜在的可选技术组合很多，分布式账本技术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即便同样是在分布式账本技术环境下进行，不同国家在测试时选用的基本平台也有所差异。

中国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充分调动各方优势，紧密合作，由于不预设路线，因此数字人民币的研发涉及多种不同技术，通过竞争激励机制来实现机制优化升级，从而进一步实现协同开发与运营，并会随着用户需求和发展目标的变化，在未来融入更多技术。数字人民币依赖 11 项技术构建核心技术体系，同时采用分布式架构体系，重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目前，为了保证用户的信息安全和运行的高效率，我国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吸收了互联网和区块链的最新技术成果，包括加密技术、隐私保护技术、身份认证、账本技术、数字钱包技术等。而虚拟货币主要采用区块链技术作为其基础底层技术。

（七）发行方式

为保持央行数字货币的属性，实现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目标，我国的数字人民币双层投放体系应采用中心化发行模式，原因如下：第一，因为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其债权债务关系并未随着货币形态而改变，因而仍必须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第二，需要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调控职能；第三，不改变二元账户体系，保持原有货币政策传导方式；第四，为避免代理投放机构超发货币，需要有相应安排实现央行对数字货币投放的追踪和监管。

而以比特币、以太坊为代表的虚拟货币以“去中心化”为核心发行方式，这改变了传统货币的信任机制和价值基础，使货币的价值基础和信用保障不依赖发行主体或发行储备资产，并可以绕开中心中介实现价值的点对点转移，整个区块链网络由众多的用户节点构成，没有货币的发行和回收的中心管理机构。比特币安全与自由的性质，根本保证就在于去中心化。

（八）货币职能

数字人民币属于信用货币的创新和拓展，可以使货币服务和调控功能更加高效，增加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清理货币政策调控空间，创新传统货币政策的

调控方式，增强中央银行调控货币政策的能力。与之相反，虚拟货币为挑战现有货币体系而生，因此，不具有货币管控的职能，而是央行管控的对象。

（九）匿名性

匿名性包括交易双方匿名和交易对第三方匿名。就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而言，有关交易双方匿名性的争论较少，人们普遍支持这一保护交易各方匿名性的举措。关于匿名的争论主要在于对第三方匿名。反对者认为，如果第三方保持匿名，将不利于防止和打击逃税、资助恐怖主义和洗钱等犯罪行为。虽然零售中央银行的数字货币被视为现金的替代品，而现金本身是完全匿名的，但央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实现完全匿名，毕竟，现金匿名并非有意为之。数字人民币是可控匿名的，其能实现交易双方完全匿名，但对监管部门无法匿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虚拟货币在上述两方面都是匿名的，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可以实现完全匿名。2020 年韩国群体网络侮辱女性的“N 号房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韩国警方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作案人员通过门罗币、比特币等收取费用，主犯拥有 513 个数字货币钱包，其中一个钱包金额高达 32 亿韩元，折合人民币近 1900 万。警方发现，主犯赵主彬向会员收取 25 万至 150 万韩元等值的比特币、以太币、门罗币（Monero, XMR）。赵主彬向会员推荐门罗币，使用门罗币支付入群费的用户有 100 多人。不同于其他加密货币，门罗币的匿名性相对较强，无法追踪交易双方的信息，原因是比较难追踪。

（十）金融监督与协调

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是双层运营模式和集中发行模式，确保中央银行发行的中心位置，实现货币由中央银行监督，加强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传达效果。可控匿名的特点满足了公众对隐私保护和安全的需求，同时又能有效防止洗钱、恐怖融资等违法活动。

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是基于市场需求的加密货币，不受政府管理，也不受央行控制。理论和实践表明，他们对目前世界各国金融体系运转和监管方面都产生着巨大的冲击与影响。

二、推行数字化人民币的划时代意义

（一）数字化人民币对货币体系的影响

1. 创新传统的货币发行体系

在不计息的情形下，央行数字货币仅是将法定纸币的数字化，主要改变的

是货币形态、发放方式和支付结算方式，货币本身并没有颠覆性变革。央行数字货币与纸币都是央行的负债，依靠央行的信用担保做支撑，具有法偿性。央行数字货币实行的是强中心化管理，央行是管理中心。法定数字货币机制下，中央银行对货币市场的调控有更加直接的权力，进一步强化货币调控性。同时，央行数字货币实行分布式架构支付系统的松耦合方式实现可控匿名，并且在发行过程中用了密码学技术、分布式账本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信息技术，从而使得货币体系运行更加安全、智能、高效。与纸币和电子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在货币发行体系的设计上具有更强的创新性。

双层运营体系方法发放数字货币，是对传统货币投放二元账户体系的升级。在此模式下，中央银行 100%准备金制将央行数字货币兑换给商业银行，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央行数字货币系统由中央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商业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以及认证系统所构成。中央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系统接收申请方请求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申请，中央银行的发行系统对其请求进行业务核查，核查通过后，向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发送扣减存款准备金的请求。中央银行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系统在接收到会计核算数据集中系统发送的扣款成功应答后，将央行数字货币发送至申请方。

2. 提高货币管理的可控性

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采用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并进行数据的有效管理，使得实现科学的、可控性的货币管理成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财政“赤字化融资”，防控流通体系内流动性过剩，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率等问题。具体而言，央行数字货币可控性管理主要由触发性管理和回笼管理构成。

3. 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流通的影响

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意味着现金 M0 将逐渐被取代，但并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流通中的货币职能是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论是公众手中的现金还是在研发过程中央行数字货币都将在流通领域履行该职能。但现金是实物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基于加密技术的数字化货币，它们在执行流通手段时是存在着一定差别的。

考虑以下货币流通的简单例子，商品所有者将商品销售给货币持有者。商品所有者让渡商品获利货币，货币所有者让渡货币获利商品。现金始终存在于流通领域发挥商品交换的媒介作用。在央行数字货币流通模式下，上述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数字货币流通主要通过从付款端央行数字货币保管箱转移到央行数

数字货币管理端和收款箱来完成的。其中，付款端的数字货币保管箱存放加密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具体流通过程如下：首先，在付款端，付款方依据付款金额和预定义的匹配策略，从付款端的央行数字货币保管箱中选择央行数字货币字串，组成支付来源的央行数字货币字串集，并将其发送给管理端，这个央行数字货币字串具有金额字段和所有者标识字段。其次，在管理端，它将支付来源的央行数字货币字串集中的央行数字货币字串登记为作废状态。最后，根据付款金额生成支付去向央行数字货币字串，并将支付去向的央行数字货币字串发送给收款端，支付去向央行数字货币字串金额为付款金额。可见，在央行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所有的支付均是以数字化形式完成的，与纸币相比其漏损率相当低，并有助于观测到每笔资金的流通数量、方向，提高了商品交易过程中的效率和资金精准性。

（二）数字化人民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仅作为一种数字化的不计息资产——现金 M0 的替代，那么，此时它相当于传统支付工具的变体，不会对货币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调控形成太大冲击。然而，央行数字货币在货币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化，对货币政策带来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如果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一种计息的流动性资产，它可能成为央行一种新型价格货币政策工具，可能会从货币供应、利率政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从而影响货币政策实施效率。在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下，货币发行的可控性加强，由此对货币政策衍生出一系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货币供给机制，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1. 对货币供给机制的影响

法定数字货币将会对流通中的现金通货产生替代作用，这不仅会减少流通中的现金，还会间接地影响银行体系的活期存款和银行准备金，从而对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乃至货币供给机制产生影响。

第一，在基础货币方面，当央行数字货币出现后，基础货币中应该包括央行数字货币，因为央行数字货币发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替代流通领域中部分现金；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出现没有用完的余额，可以将其存入数字钱包里，也可以存入自己的账户里。如果存入账户里就参与到准备金之中，就构成基础货币的一部分。

基础货币的数量也会受到央行数字货币的实施而减少。由于央行数字货币

需要替代大部分现金，以及央行数字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短期内通货数量会大幅度下降，大量的通货导致准备金短期内大幅度上涨，但这大量的通货不会全部成为银行的准备金。那么，短期内基础货币总量是下降的。但从长期看，通货和准备金量仍然会下降，基础货币总量也会下降。基础货币量下降不等于货币供给下降，还需要分别观测准备金的数量等情况。

第二，在法定准备金方面，由于法定准备金是根据央行的具体货币政策确定的，与货币形态无关，即央行不会依据持有数字货币还是持有实物货币而差别设定法定准备金数量，因而数字货币不会对央行制定的法定准备金率造成直接影响，而法定准备金可能会由于在数字货币模式下的货币政策调节差异而间接发生改变。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压缩银行体系超额准备金数量。

第三，在货币层次划分方面，无论央行数字货币计息与否，数字货币为流动性最强的金融资产，对传统的各级货币层次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缩小货币层次之间的流动性差异以及现金和活期存款这类传统的流动性较高金融资产的占比下降。一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的低成本、高流动性的特点，使得不同金融资产形态间的转换很容易实现，货币层次之间的流动性差异将逐渐缩小，货币层次依据流动性程度将向更高的层级运动，使得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关注流动性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负相关，在相同的流动性损失程度的前提下，公众更愿意持有流动性较低的金融资产，此时货币层次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表现为现金以及活期存款的数额下降，流动性程度较强的交易性货币 M1 在货币供给量中的比重降低。尽管这种交易性货币占比下降趋势与近年来移动支付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即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非现金交易导致了以传统货币层次计量的交易性货币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由于央行数字货币的高信用等级、支持离线支付、具备平台间的兼容性等特点，这种趋势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2.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第一，优化货币政策工具，强化基础货币投放精准度。中央银行通过大数据中心、登记中心和认证中心这三大中心管理模块获得前期所有的经济信息，结合人工智能确定精准的央行数字货币发行量，并对数字货币发行进行严格的前瞻性条件设计。再将央行数字货币从其发行库发至商业银行库，并设置成未生效状态。当商业银行准备向社会提供数字货币服务，并且满足政策要求条件

时，前瞻条件触发机制开始发生作用，央行数字货币生效，由此进入经济社会的生产中。因此，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调整。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可以加大投放，刺激公众的消费，消费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当经济过热时，可以减少投放，限制过度消费，降低经济过热的程度。如果用央行数字货币投放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可以加大或减少不同产业的投放量，配合其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发挥作用。在数字经济的条件下，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其货币的投放是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实现精准投放的。

第二，扩大负利率政策的空间。央行数字货币所有的优势将增大利率政策的实施空间。中央银行通过收取手续费、钱包保管费等手段实施负利率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央行数字货币利率可能是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传统的实物现金经济中，使用货币政策有时会进入“流动性陷阱”里，随着全球经济增速的下滑，一些国家的央行不断下调基准利率、甚至使得基准利率逼近于零。2020年11月18日，我国财政部顺利发行4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7.5亿欧元，发行收益率为-0.152%；10年期20亿欧元，发行收益率为0.318%；15年期12.5亿欧元，发行收益率为0.664%。其中5年期采用溢价发行，票息0%，首次实现负利率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订单规模达到发行量的4.5倍，投资者群体丰富，涵盖央行、主权基金、超主权类及养老金、资管和银行等。这一现象可能让人迷惑：借出100元最后可能只能偿还99元，为什么在负利率情况下，投资者还抢购呢？在过去几年，传统观念大肆呼吁各国央行大幅降息以促使消费者放弃储蓄扩大消费，从而提高通胀率刺激经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和日本央行也纷纷选择降息至负利率。然而，事实上，日本央行不仅没有达到其通胀目标，反而导致通胀率越来越低。欧洲央行、瑞士央行等其他采取了负利率政策的央行情况也是一样。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洲央行货币宽松再度加码，欧元区负利率盛行，其中，2020年11月18日德国5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76%。由于欧洲疫情反复，通胀走弱，而欧央行货币政策开始加码，但财政政策暂时没有更大的新举措出台，欧洲复兴计划要从2021年第二季度才开始实施。因此，基本面和供需关系可能仍会压制欧元区利率，使得欧元区利率维持低位甚至继续走低。而在央行数字货币环境下，央行可以预先公布利率，减少电子账户的余额，直接通过调节利率来进行金融财政刺激，实现在实物现金经济中无法有效实施名义负利率，鼓励公众和企业消费，有效缓解金融危机严重时期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受限问题。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行，为了刺激经济也可以实施“直

升飞机撒钱”方式的货币政策。利用官方电子账户，政府可以很方便地向公众转入或转出央行数字货币，以直接调整经济体持有现金的数量。面对经济疲软或危机临近时，银行放慢甚至终止外部货币创造的窘境，央行可通过这一渠道迅速地向经济中注入大量外部资金，大幅度降低通货紧缩风险，有效增加社会需求。

第三，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法定数字货币采用了分布式记账、大数据系统以及条件触发机制等创新机制，这些新元素的加入将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产生影响。

首先，从利率传导渠道来看，数字货币的替代作用对利率水平本身并无直接影响，利率的收集和获得在大数据系统下将会变得更加便捷、及时，分布式记账技术的应用会使得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中介环节扁平化，金融市场流动性得到提升，在法定数字货币背景下利率传导机制将更加通畅。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后能够增强利率的灵活性，增加利率的可测性，同时提高市场利率的弹性。央行数字货币会减少现金与其他金融产品之间的流动壁垒，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买卖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各种理财产品，活跃金融交易。随着金融资产价格转换速度加快，公众的消费和投资对利率的敏感性不断提升，央行可以实现以利率为目标来影响资金流向。从市场利率定价层面，大数据系统和条件触发机制的应用将会使得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的能力加强，金融机构定价水平将得到显著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货币的流动性将得到有效提高，这使得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不断增强，有利于培育市场可接受的政策利率。从缓解利率传导时滞性层面，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有可能缩小利率渠道传导的时滞。一直以来，货币政策存在着时滞问题，当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以后，央行在获取经济信息时受到来源和统计的时效限制将有相当程度的缓解，这使得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判断、制定货币政策、实施政策的时间成本得以降低。

其次，从信贷传导渠道来看，条件触发机制的设计可使得央行对货币的运行和投放进行全面控制。“时点条件触发”机制的设计使得央行对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进行时点控制，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的每一个时点都能够实现实时监控，减少信贷传导路径的时滞性，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资金在银行体系内的空转。“流向主体条件触发”机制的设计可以使央行对信贷投放对象进行控制，限定商业银行贷款的主体、实现贷款的精准投放，从而提高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此外，通过引入信贷拍卖机制，将直接约束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减少信贷传导过程中，商业银行道德风险行为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性对货币政策信贷传导通畅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

最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传统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由于存在渗漏和阻塞等问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以后，这两个问题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其一，对于渗漏问题，法定数字货币发行以后，货币当局不仅可以记录每一笔交易，还可以实时追踪资金流向，提高现有的监测控制体系，从而能够有效地遏制监管盲点。同时，地下资金流动和资本抽逃行为也能够被有效地监控，在银行体系和非银行金融体系间的套利资金虽然不能得以实现完全的监控，但可以借助数字货币的信息优势被较为精确地计算出来，从而调节货币供给速度和维持适度的货币增长率。再辅之其他的政策工具吸收沉淀银行体系以及流通领域过剩的流动性资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将得以缓解，货币政策效率的改善将使其有效性获得提升。其二，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阻塞问题，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可以有效监测其实时的资金流向，约束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遏制不良贷款增长。基于信息优势，央行可以实时监测商业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情况，及时进行窗口指导。同时，随着法定数字货币的使用，央行不仅可以实时监督企业资金的使用效果，避免企业过度杠杆行为的发生。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看，商业银行可以借助信息优势向关联企业提供宏观经济发展的信息，从而使得企业得以精确地搜寻出有利于企业价值增长的项目，从而促进货币政策能够及时落地。

3. 数字化人民币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1）重塑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

第一，改变商业银行的表内业务。在央行数字货币计息的场景下，央行数字货币可能影响银行负债端资金来源并影响负债成本，从而影响商业银行净息差水平。信贷业务反映出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开展资金融通活动，计入并影响资产负债表状态。信贷业务经营状况直接受负债端成本和资产端收入影响，最终以净息差变动来呈现。一般情况下，银行通过设置买卖价差获得收益，同时，由于存贷现金流存在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期限错配等问题，银行将进一步综合考虑信贷风险与收益的情况，配置风险与收益组合，确定信贷业务经营策略。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为计息的流动性资产，由于居民始终愿意持有一定数量的低息活期存款，居民有可能将银行活期存款兑换成法定数字货币，将部

分资金沉淀在数字钱包中，造成央行数字货币对活期存款这部分电子支付形成替代。由于央行数字货币是央行的负债而非银行负债，银行存款与央行数字货币的转换导致一般存款的稳定性降低。为了稳定活期存款来源，负债端存款利率或有上行。

第二，更新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除了上述传统商业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之外，央行数字货币或将影响支付清算结算和数字货币托管两类表外业务。在支付清算结算方面，银行提供多种借记、贷记支付清算结算工具，向收付双方收取一定手续费。相比第三方支付机构侧重小额零售支付服务，银行为其同业及企业间提供的大额支付清算业务。当央行数字货币应用于大额支付清算场景，银行可在央行数字货币业务库之间转移资金，此时业务库起到了原先同业清算账户的功能，银行支付结算业务规模将受影响，导致银行损失该类表外业务收入。在托管方面，银行可作为证券类产品的资金托管机构。央行数字货币二元运行模式中银行账户与数字钱包相互绑定，数字钱包托管在商业银行的模式与传统的表外托管业务模式类似，托管数字钱包将作为一种新的表外业务，向使用钱包的客户收取一定托管费用，或是通过低费用政策推广钱包，吸引客户流量以开展其他增值业务。

（2）重构第三方支付

央行数字货币有国家信用背书，获取了无限法偿性特征，也就是任何交易场景都必须无条件接收，克服了第三方支付存在业务壁垒，实现不同平台间存在的认可、消除间隔障碍。同时，相较于第三方支付采取的是紧耦合模式，所有支付须绑定银行账户进行，而且必须采取在线交易，央行数字货币采取的是松耦合模式，即用户既可以将数字钱包与银行账户绑定，也可以依靠数字钱包独立运行支付，这样可允许在各个场景实现交易双方短暂离线，央行数字货币的支付便利性相对更高。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作为支付手段依旧是多元化且相互兼容，其流通载体也同样不会全面脱离第三方支付渠道，未来第三方机构可能会将注意力集中于数字钱包的支付体验，通过差异化竞争吸引客户，也不排除第三方支付与商业银行之间保持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如果商业银行在作为数字货币存储主体的同时，还可以运营央行数字货币钱包业务，就会对第三方支付不可避免地产生的挤出与替代效应。在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下，由于央行数字货币运行模式的可控匿名等设计要求，即只有央行或是居民自己在特定情况下可获知交易信息，央行数字货币将会对第三方支付

机构的支付业务形成部分替代。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用户交易流量且获得的信息优势降低情况下，基于交易数据构建的大数据服务也将受到同步影响。此时，第三方支付机构大概率失去交易记账资格及交易数据信息，其撬动大数据服务而发展的征信、风控等业务将受到影响。第三方支付可凭借的数据积累精准捕获优势将转移至央行，缺乏竞争优势的第三方支付不仅面临用户大量流失风险之痛，而且盈利渠道与空间也将遭遇残酷挤压，衍生性与拓展性业务半径发生收缩的同时还会产生中断风险。

（3）提质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

第一，改善支付效率。从功能金融观点看，任何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帮助不同地区或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时间配置中使用经济资源。其中，金融体系三大核心功能表现为：便利清算和支付、聚集和分配资源、风险分散。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下，金融体系的支付系统不仅能够通过兼容信息技术以更低的成本管理现金账户，而且中央银行将拥有自己的数字货币视为增强支付系统弹性和增强行业竞争的一种手段，降低支付系统的进入门槛，促进支付市场的竞争，从而有效提高数字经济交易效率，降低数字经济交易成本。金融体系对商品、服务支付和资产的清算和结算功能可以使央行数字货币低成本、高效率地稳定运行。在资金支付上，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进行点对点即时支付结算，方便快捷，省去中间方对账、清算、结算的流程，降低支付成本和错误率，提高支付效率。同时，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的数字签名技术可以做到交易的防抵赖，还可提供可控的匿名性，保护合法用户的隐私，为数字经济营造良好的交易环境。此外，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升级支付系统，优化金融基础设施，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安全保护有效性，从而增强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第二，加码普惠金融。央行数字货币研发是改善银行体系普惠金融功能的重要内容。从理论分析来看，普惠金融发展的挑战来源于信息不对称。由于传统金融体系中金融产品的服务属性，提供金融服务需要高昂的客户可达性与客户理解成本，使得金融机构无法以可承受的成本提供既“普”且“惠”的可持续金融服务。而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尤其是金融科技（Fintech）的深入应用，让金融服务触达用户和理解用户的成本结构有了范式性变革。数字普惠金融尝试通过数字技术为原来的受限人群提供一系列合宜的、负责任的金融服务，包括支付、转账、储蓄、信贷、保险、证券、金融规划和账户报表等，提供服务

的金融机构成本可控，在商业上可持续。数字货币可以体现或携带于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又可以应用于移动终端、PC 终端或卡基上。通过提供更丰富的终端选择和更多的便民服务搭载，改善数字弱势群体的使用感受，在此过程中实现提高社会交易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减少清算环节、降低经济运行的总体交易成本，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广度和质量，促进实现普惠金融所追求的包容性增长目标。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具备最高的信用等级，交易过程经过加密技术且交易信息仅对央行披露，有效提高公众接受性和市场公信性，完善数字货币生态体系，提升普惠金融覆盖面。央行数字货币采取的松耦合模式，降低对银行账户的依赖性，可以依靠数字钱包独立运行支付，在依托线上支付的同时也可支持双离线交易，补充网络覆盖不到的地方交易，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如果央行数字货币作为与移动支付的电子货币同等重要的支付手段，那么央行可以及时掌握情况，使用全面、有效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估数字普惠金融的进展，从而对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有效的调控与监管。

（四）数字化人民币对金融监管效率的影响

1. 优化宏观审慎监管

在法定数字货币模式下，央行凭借大数据分析等新监测手段，能够强化监管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准确识别金融体系风险点，减少监管盲点，并借此创新监管工具和手段，扩展监管覆盖范围，增效监管干预，提高宏观审慎监管效率。从央行影响货币派生的调控机制来看，央行数字货币提高央行对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效率，完成宏观审慎金融监管。

在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下，基于“通证”记账，央行更加清晰高效地捕捉每一笔货币交易流转信息及货币的去向，从而可以降低央行监管成本。在传统支付和监管框架中，央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需要使用统计指标、财务报表数据，采用现场、非现场检查等方式来实现监管，成本较高，时效性较弱。尤其是追踪一笔特定货币的具体流向时，必须“拆解”货币流转途径的所有账本，监管效率较低。央行数字货币基于“通证”的信息记录模式，意味着央行登记中心记录了数字货币权属、交易流水等详细信息，无需进行“证账”相符检查，监管成本下降。可见，央行数字货币推广后，央行可更为方便地纵向追踪货币流向，提高监管便利性。

2. 改善地下金融监管效率

依据央行数字货币的触发管理和回笼管理，流通领域的货币是可控的。数

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具有可追溯、可跟踪的功能，央行能实时掌握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这些行为都会在交易来往的账目中表现出来，都会在大数据中得到反映。这样可以提升对洗钱、偷税漏税、恐怖融资等行为监管能力，打击金融犯罪和恐怖主义，减少逃税、公职人员腐败等行为，降低反洗钱与打击恐怖主义融资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大数据分析中心与认证中心的结合可以增强中央对货币体系的管控，提升反洗钱、反恐融资的信息识别能力。在识别非法资金交易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可通过大数据监控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行为。虽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一些行为特征、锁定真实身份。如利用大数据识别赌博交易时，可以根据交易时间（通常是在午夜12点以后）、交易额度及其变化（无零头交易且交易数额波动剧烈）等特征进行识别。再如利用大数据识别电信诈骗时，其特征是大量分散的钱集中到一个账户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开，消失在很多个账户中。此外，出于反洗钱考虑，央行数字货币对数字钱包有分级和限额安排，如用手机号码注册钱包级别最低，只能满足日常小额支付需求，如果能上传身份证、银行卡则可提升等级，如果能到柜台面签，可能就没有限额。

（五）数字化人民币对跨境支付体系的影响

1. 重塑跨境支付体系

中国加入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竞争，依托移动支付体系，希望借助于央行数字货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国际结算体系，利用欧美市场暂时疲软，中国市场持续稳定的宝贵窗口期，抢先布局亚太市场。目前人民币跨境清算结算主要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来进行，包括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跨境投融资结算及金融市场业务结算等业务。虽然CIPS可以对接外汇、大额支付等多种交易系统，具有较高的跨境支付效率，但CIPS需要跨境企业和个人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才能实践交易。在央行数字货币模式下，使用者无需开设人民币存款账户，只需拥有央行数字钱包的使用权限就可以进行跨境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人民币在境外的适用范围。同时，互联网支付为央行数字货币大规模跨境支付铺开了基础性框架。在过去十年间互联网支付体系的建设中，中国并已经成功依托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一带一路”倡议铺设的沿线国家开展了国际市场互联网支付的尝试。在央行数字货币落地发行场景下，通过借助这些移动支付网络扩宽现阶段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并形成数字人民币为第一单位的亚太地区新数字支付线上系统，推动数字人民币在亚太市场中发挥支付与结算

职能。这样有望打破原有支付格局，客观上对美国占优势的支付市场带来冲击性影响。

2.改善跨境支付网络

以数字货币为载体的分布式支付网络在跨境支付场景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在提升经济效率和改善市场结构方面展现出一定优势，有可能改变传统基于代理行模式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

首先，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提升经济效率。以数字货币为载体的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将呈现更加扁平化的结构，并实现点到点的支付结算过程。在这种模式下，分布式的跨境支付网络可以自动跟踪支付、优化流动性和加强风险管理，大幅降低传统系统涉及的各项运营和操作成本。分布式账本技术与其他技术相结合，能够促进信息共享，有效降低跨境支付的合规成本。由此，使得跨境支付变得更便宜、更便捷，提升跨境支付的经济效率。

其次，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改进市场结构。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数量将增加，规模门槛将有所下降，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结构。在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中，信息共享程度较高，数字身份使终端用户更易在服务提供商之间转换，从而减少中介机构凭借掌握客户专有信息所获得的范围经济。更重要的是，分布式跨境支付网络能够同时带来附带价值信息和其他信息，实现资金和信息的同时转移，使得 SWIFT 服务的排他性下降。同时，一些国家（地区）的央行已经在尝试分布式的银行间跨境支付系统，以 CHIPS 为代表的中心化的清算模式也将受到挑战。

（六）数字化人民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

1.助推人民币国际化

自 2016 年人民币首次被 IMF 录入 SDR 篮子后，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开始回暖。2020 年 5 月，SWIFT 最新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球市场最具活力货币排行榜中列第六，占全球支付总份额的 1.66%，与 2018 年 4 月同期持平。相较而言，已多年占据全球货币体系主导地位的美元仍不断在巩固其市场份额和领先身位，美元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产管理方面依然坐拥主导权，美元所占比由 39.21% 上升至 43.3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体量中的占比存在明显差距。

此时，数字货币的出现给予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一个全新契机。用人民币串联国际市场尤其是亚太市场，促进区域新型多边国际关系新格局已初见成效。

数字人民币在落地试验窗口期结束后，通过打造数字人民币的衍生内容，加速和现有人民币国际支付网络的接轨，将成为未来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展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金融发力点。数字人民币的公开发声，增强了国际社会对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优化了人民币国际化大环境。同时，数字货币相较传统货币更具穿透力，能够绕过地理边界对国际市场进行更为顺畅的渗透，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和使用者的关注。

以央行数字货币链接盘活的金融生态环境可视为应对“疫情新常态”的金融制度创新，是中国进一步升级数字经济，让中国金融市场在数字维度衔接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重大举措，也让国际社会直观感受到中国金融市场在未来继续开放化、数字化、国际化的基本进化趋势。

另外，人民币数字化是解决对外直接投资的投后追踪问题的最佳方案，尤其能在以人民币为主要投资结算货币的国际投资项目中发挥作用。在输出和使用均采用人民币为唯一币种的对外投资中（如面向东南亚、中亚等欠发达地区的部分跨国投资项目），使用数字人民币能对资金从出发、中转、落地、投入、回收的全链式过程实时收集数据，追踪投资效率，使项目资金做到精准落位。

数字货币绝不仅是简单的支付工具，而且是围绕数字货币所产生的一系列商业管理所形成的数字货币大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数字货币为中心的应用网络会面对多方向、横跨多产业衍生出丰富的金融内容，对接现有各大互联网的商业平台，实现支付方式和内容的彻底数字化。同时，随着各国央行均积极地推进数字货币计划，数字货币的国际化信号已非常明显，“数字货币+数字经济”将成为未来市场模式的基本框架。数字人民币将帮助国内市场普通消费者打开面向国际市场商业内容的消费之窗，也为更多的中国中小型企业消除跨国金融阻力，创造与国际客户直接互动的机会，这些均有助于提升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频率。

目前，在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的应用过程中，依然绕不开第三方金融机构（如代理行）的介入，存在支付费用较高、速率较慢等缺点。数字人民币的数字加密机制和点对点直传特性能够有效缓解这一问题，不仅完美解决了国际间支付的安全性问题，而且可明显消除人民币国际应用中的中介门槛，从而进一步刺激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使用率，增强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用户黏度。

2. 数字人民币战略赋予人民币国际化机遇

第一，拓宽人民币国际化空间。随着数字人民币的崛起和由数字人民币串

联的新型区域经济力量不断增加，给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拥有高度地缘敏感性和国际政治倾向摇摆不定的区域，如东欧、中东、南亚诸国，带来一个更经济、更便捷、更少不平等政策干预的新金融体系依附选择，美国及其盟友将可能失去对部分国际市场的把舵和监控能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遭遇到潜在竞争对手的多方位打压。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人民币挑战数字美元，数字美元驱逐数字人民币的基本竞争态势不会改变，数字人民币将在国际货币竞争中生存。

第二，增加人民币国际化机会。首先，通过大宗物品数字结算，发挥买方优势和规模效应，形成大宗商品现货贸易数字货币的应用生态圈，提高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定价权，逐步扩大数字人民币结算规模。利用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技术，可实现我国在大宗商品领域采用数字人民币的交易结算机制，打破美元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的垄断。

第三，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在经贸合作中通过主权数字货币的应用，提高了数字人民币信任度。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数字支付基础设施方面已经初具规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服务延伸至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形成金融与“一带一路”建设良性互动。在此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广数字人民币应用减少了障碍。

第四，数字货币和数字贸易结合，数字货币支持数字贸易发展，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的使用空间。近年来，全球电子商务贸易额增长保持高速，其中，商品、服务类电子商务交易额、电子商务服务业营业收入均达到了双位数的增长速度，这为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相当大的发挥作用空间。

第五，央行数字货币与微信、支付宝结合，共同拓展了零售支付领域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加快发展境外市场，支持了支付服务、技术、标准的对外输出，拓展了境外支付业务领域，为数字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更好的支付环境。

3.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数字货币竞争态势，构建“数字货币区”将开启数字人民币国际化的征途，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数字货币区”理念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把传统最优货币区（OCA）和数字货币区（DCA）的优势叠加，在特定物理空间区域打造最优“数字货币区”来实现。这既发挥了网络资源优势，又突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地理位置接近”特点，创造最佳金融环境，为央行数字货币国际化试点测试提供理论依据，为央行数字货币率先落地

运行提供实验空间。

货币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家层面经济基础的映射，一个成功的国际化货币离不开三大要素的支撑：稳定的大经济格局和贸易量，开放、包容、流动的资本市场环境，货币的自由稳定兑换程度。近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已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未来数字人民币的全球化推广夯实了基础，在继续有秩序开放金融市场的新形势下，数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进一步铺开前景可期。人民币要继续坚持国际化道路，数字人民币提供了优质的上升动力。一个只在本国市场流通的数字货币具高度金融风险，容易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孤岛，难以实现国际金融资本对经济建设的助力作用。在数字货币时代，数字人民币需积极同国际数字货币市场接轨，保持宏观监督效用的同时开拓数字交流渠道，打造丰富的数字人民币国际市场使用场景，真正赋予人民币成功国际化的定义。

（七）数字人民币对全球货币竞争的影响

随着技术进步，货币竞争的重心不断推移，从传统货币竞争向数字维度转变。从国际货币市场格局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演化趋势是美元地位的下降。随着美国经济实力和在全球整体主导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欧洲和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然而，全球范围内暂时还没出现可以挑战美元的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的推进和发行可能促使全球货币竞争格局步入新的阶段。

1.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数字货币竞争

数字经济的进步需要数字货币的支撑。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应用场景创新，各种数字货币应运而生，数字货币背后的分布式账簿、数字合约等技术应用于金融场景，可以提高现有支付结算体系的结算效率、增加交易透明度，让交易全程可追溯、不可篡改，这被视为未来货币的发展方向。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不仅将重构经济、金融的模式，而且将会成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撑技术，改变货币清算方式乃至主权货币发行机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信息互联网变成价值互联网以后，需要数字金融成为推进数字经济的强劲动力，数字货币将处于未来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的核心地位。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主权将与金融主权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构成各国综合国力的重要部分，此时各国间的金融竞争将逐步延伸到数字金融领域，其中数字货币或将成为“新竞争”的关键。掌握数字货币的技术和发行的主动权将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全球支付与货币体系的影响力。数字货币竞争与传统货币竞争存在很大不同，所关注核心不再是币值稳定问题，以格雷欣法则下的劣

币驱逐良币可能不再成为引起货币竞争的核心逻辑。尽管宏观层面的供给缺少弹性使得私营数字货币难以成为法币，但在微观层面，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支付工具的效率。数字货币以互联网为基础建立的商业和社交网络，能够让信息无障碍流通，货币如影随形跟进，使得数字货币竞争领域更宽阔，场景更丰富，在很多领域甚至颠覆了货币原有形态，具备超前布局数字本币战略的基础功能。

2. 央行数字货币竞争下的国际货币格局

在数字化的国际金融市场中，数字美元仍可能是影响国际货币支付格局的最重要一极。首先，从国家综合实力方面来看，美国拥有现今国际上体量最大、制度最成熟的金融资本市场，是全球金融资本产生和流动的最主要地点，它的行情和动向均对全球经济有着根本性的牵动作用。同时，美国还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倡导者和多个国际组织的实际主导者，在多个跨洲跨洋国际组织中处于单核或共同领导地位，通过对国际组织的幕后操控来完成维护美元在国际清算体系中地位的策略也将在未来无限期延续。其次，从金融体系来看，美国坐拥位于国际支付和金融体系的核心绝对优势。美国不仅掌控国际市场交流的金融渠道，而且拥有 SWIFT 系统、VISA 和 MASTER 支付体系，使得央行数字货币时代的国际清算支付体系仍然将以美国利益为主导。在未来数字美元带来的额外便捷红利下，借助美系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全球覆盖，进一步巩固美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领先地位。最后，央行数字美元所具备的国际市场硬通货特性将增强美元的优良国际流动资产特性，更多的商业机构和贸易体将选择在数字交易中使用数字美元，或使用数字美元作为后备资金储备，这将进一步拉升国际市场对美元的需求。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借力于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产业链的进一步开放，经济综合实力和金融稳定性增加，使得数字人民币拥有挑战美元在国际支付体系中单极独大的趋势，但由于现阶段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经济实力不相匹配，人民币国际支付方面的地位有待在数字货币模式下获得提升。近年来，中国移动支付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两大巨头阿里和腾讯已建立了传统银行支付渠道之外的“平行银行系统”，它们各自的数字钱包都拥有超过 10 亿的用户，为全球金融体系建立全新数字架构带来积极影响。推进人民币数字化是提升人民币成为全球主要支付货币、储备货币的重要手段。

三、推行数字化人民币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央行数字货币是数字时代的全新货币形态，将对人们的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伴随我国数字化人民币试点、测试的推广，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也浮出水面。

（一）法律层面

1. 数字化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缺乏法律支撑

货币发行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权根据具体条件和需要，决定主币和辅币的面值、种类、数额和发程序。《中国人民银行法》将“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的权力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有权发行和管理各类形态的人民币。但目前法律规定的货币，局限于传统的纸币、硬币等货币形态，如《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八条规定，“人民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印制、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版人民币，应当将发行时间、面额、图案、式样、规格予以公告。”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人民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发行的货币，包括纸币和硬币”。显而易见，数字货币没有“纸币”或“硬币”形态，其货币地位缺乏法律支撑，需要在立法层面予以确认。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启动了修法程序，2020年10月23日，央行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第三章第十九条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这将为发行数字货币提供法律依据，但数字形式的定义、具体形态尚不明确。

2. 数字化人民币的法偿性地位可能遭受挑战

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具有法偿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该法条明确了人民币的法偿性。数字化人民币归入法定货币范畴之后，也应具有法偿性。但是，在实践中，数字化人民币交易需要设备、网络等技术条件的支持。如果交易一方缺乏这些技术条件，尤其在偏远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可能会发生拒收数字化人民币的现象，影响法定货币的法偿性地位。因此，在立法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有可能发生的拒收事件，对一些特殊情况做例外处理。

3. 数字化人民币的反假币和反洗钱问题

货币犯罪中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假币问题和洗钱问题。现行的《中国人民

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反假币机制。目前，法律法规中假币的定义、反假币机制针对的是传统货币形态——纸币和硬币，但不适用于数字货币的造假形式。

2020 年 10 月 23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三章第二十二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作、发售代币票券和数字代币，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但尚未说明数字货币造假的形式和相应惩罚机制。

在反洗钱方面，未来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将会使现有的反洗钱监管运作机制面临新的挑战。根据法律规定，当前负责反洗钱具体工作的主要是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由银保监会、证监会监管，但今后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其交易结算不通过这些金融机构，因此反洗钱的主要工作将从商业银行转移至央行。另外，目前的反洗钱程序、身份识别机制主要针对传统的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业务，而数字货币具有匿名性、便携性、可实现点对点支付，这都会对传统的反洗钱机制带来挑战。

因此，在正式发行数字化人民币之前，也应完善相关法律，扩张“伪造、变造人民币”的定义，将伪造数字货币的行为也纳入进来，并确立新的反假币、反洗钱机制。

4. 数字化人民币的发行、运作和监管机制都需要立法支撑

数字化人民币的发行方式、流通方式、监管机制均与传统货币存在很大差距，目前法律法规在这一领域都处于空白状态。根据“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正式推出数字化人民币之前，需要进行大量修订旧法、制定新法的工作。

在发行环节，央行与商业银行等运营机构的具体操作规范、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违法行为的惩罚机制都需要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

在流通环节，用户可以通过数字货币钱包支付、转账，并采用“账户松耦合”模式，我国数字化人民币设计了“三中心”管理模式，其中，认证中心管理用户身份信息，登记中心对数字化人民币的产生、流通、清算和消亡的全过程进行登记。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等机构在运营数字钱包时应遵守的规则、应承担的责任，也应由法律法规确定。

此外，数字化人民币流通中的权利流转问题也值得法律界的关注。2020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发布了《关于为新时期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第六条意见指出，要加强对数字货币、网络

虚拟财产和数据等新权益的保护，但具体实施细则还未公布。现有法定货币的所有权流转基本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即如果某笔货币由原持有人转移至新持有人占有，那么新持有人就拥有该货币的所有权。理论上，数字化人民币的所有权流转仍将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但是数字货币并非实体货币，更可能出现重复付款、欺诈交易、交易错误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现金，数字化人民币也有技术优势，可以与智能合约相结合。那么，数字化人民币的原持有人，可以利用智能合约限定某笔货币的使用范围、交易附加条件等。数字化人民币与智能合约结合带来的新型交易模式，也将为立法司法带来挑战。

在监管环节，主要的监管主体是央行及其下属机构，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其监管范围、监管对象、各类监管场景下的操作规范。以保护用户隐私为例，首先，应明确用户数据隐私保护的范围，即哪些用户信息（如用户身份信息、账户金额信息、交易记录）需要保护。其次，应明确具体的监管对象和监管主体。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用户的身份信息、交易清算是由央行下属的“三中心”（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大数据中心）负责的，因此，也必须通过立法确认“三中心”的用户隐私保护监管职责，其他机构或个人不得私自查询或披露用户隐私信息。最后，监管部门的行为也应受法律法规的规范和限制，根据“可控匿名”的要求，央行和“三中心”也仅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特定监管情境下查询跟踪用户隐私信息，不可超越合理界限滥用监管权力。

综上，数字化人民币是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而目前法律法规滞后于技术变革的进程，数字化人民币的具体定义、运作规范、监管框架尚未在法律层面确定下来。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发布的《数字化人民币调查问卷》也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缺乏法律基础是我国推出数字化人民币的首要障碍，其次是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在正式发行数字化人民币之前，需要完成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从立法的角度，应修订“人民币”的定义，将数字化人民币纳入法定货币的范畴，明确反洗钱、反假币机制，明确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流通主体、监管主体，并详细规定其权利义务、保护手段以及违反该法律后的责任后果。对于黑客入侵盗取数字货币、伪造交易记录、欺诈交易、重复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都应做出明确的法律责任认定，确定相应惩罚机制。

（二）运作体制层面

1. 技术风险

第一，技术路线选择尚不明确。在选择技术路线方面，数字化人民币要成

为主流的交易货币，必然需要极强的并发处理能力和效率，如 2018 年“双十一”电商购物节，支付宝订单峰值 54.4 万笔/秒，支付宝自研分布式数据库 Ocean Base 每秒处理峰值达到 6100 万次。所以，数字化人民币系统的交易处理能力至少要达到数十万笔/秒以上才能有效支撑未来海量数字货币的交易稳定性。而对于目前大家非常关注的区块链技术，中国人民银行明确表现出观望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区块链技术存在“去中心、安全性、高性能”难以兼得的“三角难题”，目前的区块链技术处理速度无法满足我国在线支付处理要求，如比特币区块链交易频率约 6.67 次/秒，每次交易需要 6 个区块确认，10 分钟才能产生一个区块，全网确认一次交易需要 1 个小时。实际上，我国央行已经意识到，完全以区块链作为底层技术，是不现实的。2019 年 8 月，穆长春在伊春论坛的演讲中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最开始研究数字化人民币的时候，曾做过一个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的原型，但无法达到零售级别的高并发要求。所以，央行最终决定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不依赖某一种技术。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数字化人民币的研发，哪家的技术路线高效、安全、被市场接受，就采用哪家的技术路线。

第二，技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作为我国法定货币的数字形式，数字化人民币代表国家信用，应实现安全存储、安全交易、匿名流通等目标。因此，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数字化人民币最核心的底层保障。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发布的《央行数字货币调查问卷》也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技术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是我国数字化人民币最重要的技术难题。央行需要利用多种技术手段保障交易安全、数据安全、账户安全，建立完整的数字化人民币技术体系。按照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一币两库三中心”设计，参与数字化人民币发行、流通、管理的机构有三类：央行、商业银行、认证清算机构。“两库”指的是数字货币银行库和数字货币发行库。“三中心”指的是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可以看到，数字化人民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多个技术平台。黑客攻击、技术故障或仅仅是人为错误，都可能影响数字货币的正常使用。近年来，数字货币频繁被黑客攻击，已敲响了警钟，如 2018 年，韩国国家公安厅公布了自 2016 年至 2018 年，共有 7 起数字货币交易所的黑客事件，黑客非法盗走的金额为 1120 亿韩元（约 9900 万美元），韩国媒体也报道，从 2015 年到 2018 年，黑客入侵虚拟货币私人钱包的事件已达 158 起，然而调查黑客攻击事件却很困难，仅 6 人被逮捕。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就经常发生大量数字

货币被盗的事件，致使持有者损失惨重。数字化人民币作为我国的法定货币，其安全性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更为坚实的底层技术来严防系统故障和黑客攻击事件，维护储户的利益，保障法定货币的地位，如加密算法是数字化人民币体系的核心和基础，需要运用多种加密算法为每一枚数字货币建立永久识别代码、识别持币人、保护账户安全、抵御外部攻击和信息篡改。数字货币的用户终端可能是智能手机搭载的电子钱包或芯片卡，也必须具备硬件安全模块和手机操作系统的可信执行环境。数字货币交易信息的存储和传输依赖于网络，也很可能遭受大规模、有组织的黑客网络攻击，因此也必须充分运用安全存储技术、传输保护技术来保障数据安全。

第三，“双离线支付”场景下，伪造、重复花费问题更加突出。在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中，未来可以像纸钞一样实现“双离线支付”。“双离线支付”是指交易双方都可以在不联网的情况下进行支付。只要手机安装了数字货币钱包，不需要网络和信号，两个手机相互碰一碰就能实现转账或支付。而双离线支付本质上是一种交易双方认可的延迟交易，首先付款方私钥对支付承诺进行签名，然后将已签名的支付承诺交给收款方。收款方在恢复联网之后，向央行提交该支付承诺，由央行验证通过、完成交易确认。在双离线支付场景中，交易结果不能即时查验，伪造数字货币、重复花费数字货币等问题将更加突出。

2. 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我国央行已基本确立了数字化人民币发行的“一币两库三中心”及用户端的数字钱包等系统架构，数字化人民币的底层技术逻辑与传统的银行存款存在很大不同，需要全新的配套金融基础设施。目前，数字化人民币架构各个层面仍然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的难题，亟待攻关。

第一，央行需要建设中央银行发行库和支撑数字化人民币运行的私有云。私有云是支撑数字化人民币运行的底层基础设施，用于存储和运行“两库”（数字货币发行基金的数据库和商业银行存放数字化人民币的数据库）的数据。私有云建设要求具有良好的弹性、扩展性、自动化、空间效率和清晰的网络层次。而且，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交易规模十分庞大，需要私有云网络系统具有很强的并发处理能力和实时交易所需的高效处理能力。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发布的《央行数字货币调查问卷》也发现，受访者普遍认为在配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中，央行的技术系统、私有云、数据库建设是首要难点，其次是对海量货币实时数据采集、监控和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建设。

第二，各商业银行也需要搭建自己的数字货币数据库和业务平台，与央行对接，用于接收和存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银行传统的 IT 系统难以适用于全新的数字货币时代，必须升级至适合数字货币和以数字化交易为核心的新系统，包括新建的商业银行数字货币数据库和业务平台，同时要对核心系统及配套业务系统进行接口改造及运营。而在客户端，也要分别针对企业和个人用户开发数字货币应用，包括改造企业向（B 端）的支付软硬件类，以及创建和运营个人向（C 端）的数字钱包。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商业银行增加在数字货币安全存储、保密性、增值服务等方面的研发投入，拓展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服务链条。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业的分化也将更加严重，具有深厚数据技术基础和强大数据库的大银行将更具优势，而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在竞争中落于下风。

第三，大数据中心的建设。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实质上是三个实现不同功能的大数据中心。作为货币运行体系的组织实施者和直接管理者，在法定数字货币体系这一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央行需要明确自己在法定数字货币运行体系的大数据主体责任：一是推进数字货币大数据顶层设计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二是要注重大数据基础设施的稳健性和拓展性，保证数据收集、分析模型、应用接口都具有良好的安全性、灵活性和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第四，用户终端的设计。根据数字化人民币的运行设想，社会公众使用数字货币的载体为手机、电脑、卡片等设备。参考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历程来看，智能手机可能是数字货币移动终端设备的最好选择。根据艾媒咨询的《2019 中国移动支付市场研究报告》，我国移动支付用户中，24 岁及以下用户占比超三成，而 40 岁以上用户仅占 11.2%。因此，边远地区、老年人口、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无法使用数字货币，更难以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可能导致金融服务可得性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进一步扩大。数字钱包是数字货币生态中用户端最基础、最重要的应用，数字钱包设计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和生态发展极为重要。由于数字货币的使用比电子银行复杂，更需要有一款好用的数字钱包工具，需要实现多重目标：便捷性、安全性、可控匿名性，同时满足央行的监管需求和商业银行的业务需求。

3. 个人隐私保护

根据目前的数字化人民币运行设想，数字化人民币将替代现金，理应保持现金的属性和主要特征，满足用户匿名交易的需求。数字化人民币将采取“双

离线支付”，在这个交易过程中，数字化人民币虽然不依赖于银行账户或第三方支付账户，但仍依赖于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开发的数字货币钱包。因此，数字货币钱包的开发者，即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是否有权限储存、查询、处理用户个人信息和交易信息？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根据目前的数字化人民币设计，为了保护用户隐私权，数字货币钱包的交易数据不对数字货币钱包的开发者——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开放，只对中央银行开放数据查询权限。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指出：“数字化人民币必须实现可控匿名，只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在松耦合账户体系下，可要求代理投放机构每日将交易数据异步传输至央行。”因此，从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思路来看，个人隐私保护程度低于现金，但高于银行账户交易和第三方支付交易。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数字化人民币作为一种数字化货币形式，不可能做到完全匿名，用户可能对于央行掌控用户信息、个人隐私信息外泄等潜在问题心存疑虑。

首先，数字化人民币的交易数据将对央行披露，用户交易信息高度集中于央行，因此，消费者很可能担忧自身隐私信息被央行完全掌控。2019年8月，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司副司长穆长春明确表示，在“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监管场景中，央行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侦查、追踪用户的违法犯罪行为。央行对用户交易信息进行监管，那么谁来监管央行避免侵犯用户隐私呢？一个重要的监管方式是，确立用户隐私保护的监管框架和工作流程，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向公众公布。在后续的数字化人民币发行工作中，也应明确仅在特殊监管场景下才可以追踪个人账户的交易历史，并以立法形式确认。在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中，央行可以根据掌握客户信息的强度不同，把数字人民币钱包分成几个等级。如果是小额支付，用户不需要披露过多个人信息；如果是进行大额支付或者资金转移，则需要用户披露更多地个人信息，甚至需要申请实名钱包，以便于追踪调查大额的贪污贿赂以及洗钱等行为。

其次，数字化人民币相关参与主体泄密、系统缺陷等问题都可能导致用户信息泄露，如相关工作人员泄密、受理数字货币的银行和商户非法获取信息，黑客利用系统技术缺陷窃取信息，这些情形都有可能出现。黑客攻击网络平台，导致消费者信息泄露的案例屡见不鲜，如2020年，加拿大税务局遭遇两次黑客攻击，包括用户名和密码在内的数千个账户个人信息被盗，黑客还利用其中一些账户进行诈骗。因此，推出数字化人民币的同时，也应特别重视用户的隐私

保障机制和安全技术系统的建设。

（三）金融系统层面

1. 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层面，可能造成“脱媒”效应

根据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向央行全额缴纳准备金，数字化人民币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有央行信用背书的数字化人民币的信用等级高于商业银行存款，而且便捷性、匿名性也更高，可能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

尤其在危机时期，央行信用背书的数字货币安全性的优势更为凸显，而且银行存款账户转换至数字化人民币账户也非常便捷，社会公众更加倾向于把存款从商业银行转移到数字化人民币账户，可能造成商业银行的挤兑危机。

即使在经济稳定时期，在当前的低利率环境下，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利率较低，因此，用户将流动性资金储蓄在商业银行活期存款账户的动力也偏低，更可能转而持有安全性更高的数字化人民币。因此，数字化人民币可能会减少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规模，商业银行的存款被央行大量吸纳。而根据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方案，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向央行 100% 缴纳准备金，即商业银行无法根据数字化人民币来派生贷款。因此，部分银行存款流失至数字化人民币账户，可能对商业银行的授信能力和信用货币创造能力产生损害，削减银行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给商业银行体系带来“脱媒”效应。因此，央行比商业银行在控制大规模挤兑和金融恐慌方面更有优势，从而造成对商业银行的挤出。在极端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存款可能全部进入央行，市场垄断可能带来效率低下，使得金融中介的期限转换功能受到威胁。

央行数字货币导致商业银行存款流失，为了对抗该效应，商业银行可能被迫提高存款利率来提高银行存款的吸引力。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上升、净息差收缩、盈利能力下降。为了保持存贷利息差，商业银行也可能同时提高贷款利率，产生逆向选择效应，偏好风险的借款人将更多地成为银行的客户，从而带来银行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同时，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盈利能力的差异化也将增大。大型银行的客户基数大、优质企业客户多、风险管控能力强、中间业务较发达，受数字化人民币的冲击可能相对较小，而农商行、城商行等中小型银行的经营压力将更大。

总而言之，传统商业银行吸纳存款，并基于存款发放贷款，行使货币创造

的职能。数字化人民币的信用等级高于商业银行存款，而且便捷性、匿名性更高，可能对商业银行存款造成冲击。目前，数字化人民币账户的使用场景主要聚集在支付结算方面，暂时没有开发数字货币信贷产品，因此，商业银行无法基于数字货币钱包中的资金派生贷款，这可能削弱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盈利模式和市场竞争态势造成深远影响。

2. 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层面，支付、清算业务收入可能下降

面对数字化人民币这一新生事物，商业银行的托管业务也存在一定风险：一是托管业务的操作风险，在数字货币托管的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因素造成的操作违规或失误，可能导致交易失败、账户被盗、信息泄露等问题；二是数字化人民币对托管业务系统和数据库的数据存储能力和数据处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商业银行托管系统和数字货币数据库的处理能力或者运行效率低下，对业务支持不足，会严重影响和制约数字化人民币托管业务的发展；三是数字化人民币推出也将随之衍生出各类新兴创新型产品，也将对商业银行的托管业务提出新的要求。

对于商业银行的支付、清算业务，根据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设计，数字货币的支付、清算、数据分析业务由央行主导、独立于商业银行的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完成，因此随着数字货币的使用越广泛，商业银行的清算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也会被削弱。而且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失去这些业务不仅仅只是损失手续费，更重要的是，根据数字化人民币的匿名性要求，商业银行不能直接获得数字货币用户的交易记录和交易数据，丧失了这些大数据中蕴含的商业机会。

3. 商业银行的人才结构、业务模式将加快转型

数字化人民币是数字形式的货币，将大量替代现金，因此，将减少传统的现金业务、柜台存款业务，减轻商业银行在清点、运输和保管方面的人力物力支出。在商业银行的人才结构方面，商业银行对出纳、柜员、金库保管员等传统业务人员的需求将持续下降，而对IT技术人员、金融科技人员、金融大数据分析师等的需求将上升。

4. 第三方支付

2020年10月，数字化人民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明确表示，数字化人民币和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不是一个维度：微信、支付宝是金融基础设施，是“钱包”；而人民币数字货币则是一种支付工具，是“钱包”的内容。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的“钱包”里装的是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数字化人民币发行后，大家仍可用微信支付、支付宝进行支付，只不过“钱包”里装的内容增加了数字化人民币。

短期内，数字化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用户数量、交易流量冲击不大，但是数字化人民币仍能对第三方支付带来竞争效应。第一，数字化人民币的交易费用更低。数字化人民币的地位相当于现金，在个人兑现数字人民币时，商业银行不应收取服务费，而第三方支付提现有一定手续费用。第二，数字化人民币的隐私保护程度更高。为了保证用户隐私权，数字货币钱包的交易数据不会被第三方支付机构存储和开发，只对中央银行披露。而在第三方支付（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交易中，交易双方的个人信息和交易记录都会被第三方支付机构记录和存储。且第三方支付往往与其他应用或软件相关联，并共享用户信息。

长期来看，数字化人民币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最大的影响在于，数字化人民币更高的个人隐私保护要求，很可能对互联网金融平台基于用户数据开发的增值服务造成很大冲击。对于蚂蚁金服、腾讯金融部门而言，支付业务是其综合金融体系的入口和基础，支付业务本身的费率水平并不高，但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积累了规模大、黏性高的消费者流量和 B 端商业场景。在此基础上，蚂蚁金服、腾讯金融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得以在消费金融、家庭理财、产业互联网等多元领域进行二次引流，以支付用户的大数据撬动征信和风控业务，拓展现金贷等小额信贷产品，如借呗、花呗；发展第三方征信，以个人信用状况分析为商业机构和用户提供风险识别服务，最终形成数字金融的综合生态体系。

但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相较于数字化人民币在支付系统的优势在于已经非常的成熟，且早已被大众所广泛接受，而数字化人民币尚处于起步阶段，消费者最终的接受情况尚未可知；此外，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了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丰富的使用场景，可以支持网上购物、购买理财产品、申请小额贷款、水电燃气缴费等各种应用场景。因此，数字化人民币和第三方支付各有优劣势，不同需求的用户可能会选择不同支付方式，因此笔者认为，未来数字化人民币和第三方支付可能会长期并存。

（四）宏观环境层面

1. 新型金融业态对监管带来挑战

在“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等监管场景中，数字化人民币可以做到“可追踪、可溯源”，也很有可能对货币发行的“黑盒子”有很好

的监管效果。但是，未来与人民币法定数字货币相关的业务可能同步创造新的金融形态，如基于数字货币的数字钱包、资产管理、网络借贷等领域，如果监管落后于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那么对现有金融稳定与监管体系构成挑战。为了应对新型数字金融业态，我国央行也开始发力数字化监管，建设数字监管报告平台，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性。

2. 数字化人民币的海外市场接受度面临挑战

第一，数字化人民币的推出，很难直接动摇国际货币系统格局。在当今国际社会，美元占据国际货币体系的霸主地位，根据 IMF 数据，截至 2019 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 60.8%。而且美国政府、企业、民间机构也在积极推动美元数字货币的研发。如果美联储与 Facebook 合作推动 Libra2.0 版落地，美元也可以迅速实现数字化。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霸主地位，加上 Facebook 的庞大国际用户体量和技術实力，美元仍很容易确立数字时代的强势地位，这将对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推广带来冲击。不仅仅是美国，西方各国有意联合研发央行数字货币，进一步挤压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海外应用空间。据媒体报道，2020 年 7 月，七国集团（简称 G7，包括美、英、德、法、日、意、加）基本决定将就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展开合作。2020 年 1 月，国际清算银行调研了全球 66 家中央银行，发现 80% 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 更是即将发行。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7 月中旬，全球至少有 36 家央行发布了央行数字货币计划。显而易见，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进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未来将面对西方发达国家数字货币的激烈竞争。总而言之，目前各国央行乃至商业机构都在积极推动数字货币的研发，但各国货币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家的综合实力、国际贸易量、国家信用、货币的稳定性等基本因素。各国数字货币的竞争可能会为国际货币体系引入新的影响因素，如数字技术实力和数字经济的发达程度，但很难从根本上动摇国际货币体系。我国的资产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仅占 2% 左右，很难通过数字货币的推行来直接挑战美元的货币霸主地位。

第二，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海外推广，意味着需要将海外金融机构纳入我国数字货币支付系统，人民币数字货币与外汇的互换，也需要让对方国家接受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技术设计和标准、符合对方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因此，我国在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推进过程中，必须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展开深入合作。2020 年 11 月，在香港金融科技周“数字经济中的央行角色”主题会议上，央行

行长易纲也表示，中国央行期待与国际清算银行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展开讨论和合作，让数字化人民币稳步发展，确保更加稳定安全的未来。

3. 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国际化可能遭到美国政府的狙击

在中美摩擦不断的大背景下，我国数字化人民币的发行可能遭到美国政府的狙击。从目前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来看，我国推出数字化人民币之后，美国政府可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狙击人民币数字货币国际化，如美国政府可能禁止美国个人、公司、金融机构交易人民币数字货币，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人民币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数字货币钱包等相关服务，甚至制裁我国的某些金融机构。这些措施都会对我国数字化人民币海外推广带来较大障碍。

而且短期内，美国金融霸权难以动摇，能够以此为基础发动“金融战”，我国反制美国的直接措施却非常有限。但我国可以着眼于长期战略，以开放对抗封闭，建设开放、高效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开拓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海外市场。2018年9月，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之际，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大幅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降低关税，建设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场环境，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在金融战领域，我国的策略应是一以贯之的，为我国人民币数字货币建设开放、高效的金融环境。第一，在国际贸易中，尤其是在与美国联系较弱、与我国经贸关系紧密的一带一路和非洲国家，争取扩大人民币数字货币计价和结算的应用范围。第二，数字化人民币的海外推广，还需要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一套服务于数字化人民币的跨境支付系统，给所有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机构和个人准备数字钱包。第三，扩大金融服务的对外开放，允许外资机构参与数字化人民币的双层运营体系，允许外资机构提供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托管、兑换、应用场景开发等服务。

根据“学习中国”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文韬 庞子玥

新时代创造新模式 新模式学习新思想

学习中国智慧党建运管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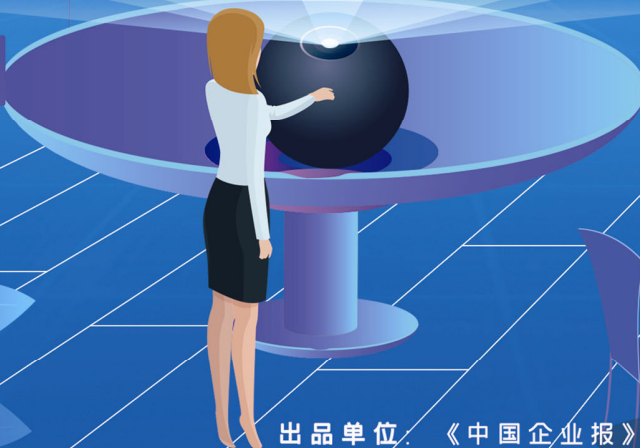
智慧党建运中心（智慧党员活动室）是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知识组织、智能云平台基础上，再运用AI、VR和多媒体技术打造的多网跨终端共享的全场景智慧化党建多功能中心，是党员个人活动和组织活动的智慧空间。它把一个传统的物理空间变成一个大的智能终端，为新时代的党建工作插上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翅膀，开启智慧党建新模式，开创全场景智慧党建新时代。

创建中心的目的

- 为智慧党建引领示范
- 构建全场景智慧化党建新模式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解决内容和技术“两张皮”问题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建设中心的重要意义

- ◆ 中心是党建智慧化重要标志
- ◆ 中心是提升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智能空间
- ◆ 解决个人学习与集体学习“两张皮”问题
- ◆ 中心是提升党员综合素质的智能教室
- ◆ 解决线上线下“两张皮”问题
- ◆ 解决单位内部的多平台和信息孤岛问题
- ◆ 解决多网融合问题
- ◆ 解决多终端融合共享问题



出品单位：《中国企业报》集团智慧党建研究院

联系方式：010-62805956、68001238

联系人：薛红霞15010167295 王强18518039399 刘红13126508885



文明十二家 盛开幸福花

WENMINGSHIERJIA SHENGKAI XINGFUHUA

文明十二家是家风建设的好形式
文明十二家是和睦家庭的芬芳园
文明十二家是幸福家庭的欢乐谷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家庭的小舞台
文明十二家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专业户
文明十二家是良好家风传承的推进器
文明十二家是淳朴民风形成的加油站



学习中国微信公号



“学习中国”APP



世界家风微信公号

刊号

CN 42-1837/C
ISSN 2095-5103

邮发代号 38-406

国内定价15.00元